

蘭癡、蘭花會與蘭花賊： 清代江浙的蘭蕙鑑賞及其多元發展

邱仲麟*

自古以來，蘭花一直被視為是君子的象徵，讀書人對其鍾愛自不待言。而對蘭花的熱愛，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峰。尤其是在江浙地區，不少研究蘭花的專業書籍與栽培手冊持續出版，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是兩波高潮。而為了滿足當地對於蘭花的需求，商人將福建、安徽、浙江南部等地的蘭花運抵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等蘭花消費量巨大的城市。江浙人士歷來欣賞的是清香的福建蘭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十八世紀末起，商人、富豪開始炒作蘇南與浙北的蘭花，重視的是花蕊的獨特樣貌。因此在約略同時，開始出現類似鑑賞指南的蘭蕙圖譜。大約在十八世紀末，上海、蘇州等多個城市還萌生蘭花會，其後雖有起有落，卻一直持續至民國時期。蘭蕙圖譜與蘭花會之出現，顯示蘭花之鑑賞越來越專業化。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有錢的商人與士人，不惜斥資購買名貴的蘭花。由於這股對蘭花的狂熱，將蘭花的價格炒高，在十九世紀初，曾有一盆蘭花賣價三千兩的紀錄。另外，名貴蘭花被偷，亦時有所聞。而且，賣方利用各種手段詐騙買方也常見於記載，迨至十九世紀末，仍有人花費一千兩，而買到的卻是假貨。

關鍵詞：蘭蕙 炒作 鑑賞指南 蘭花會 專業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係國科會（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明清社會的蘭花狂熱」（NSC96-2628-H-001-056）的成果之一。

緒論

傳統中國，文人喜好養蘭，其例甚多。唐代王維 (701-761) 「以黃瓷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北宋黃庭堅 (1045-1105) 謫居四川時，模仿王維以瓷斗藝蘭，並撰〈書幽芳亭〉，指出蘭蕙叢生，蒔以砂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¹ 蘭花開花之時，幽香清遠，馥郁襲衣，一花在室，滿屋飄香，故江南一帶以蘭為「香祖」、「國香」或「第一香」。² 另外，蘭花與牡丹、銀杏，被稱為園林三寶。文人還將梅、蘭、竹、菊視為四君子，又稱蘭、菊、水仙、菖蒲為花草四雅。宋人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姚寬以三十花為三十客，均以蘭花為幽客。曾端伯取友於十花，而蘭為芳友。³ 士大夫又多以蘭花比喻高潔之士，如宋人李綱 (1083-1140) 〈幽蘭賦并序〉說：

蘭喜生於高山深林間寂無人之境，則芬芳鬱烈茂盛而遠聞，移而置於軒庭房室之間，不過一再歲，華益鮮而香益微，蓋其天性如此。故古人又以幽蘭目之，與夫山林隱遯之士，耿介高潔，不求聞達於人，而風流自著者，亦何以異？⁴

李綱心繫國家社稷，卻未能獲得宋高宗信賴，主政不久即被罷，後來貶官海南島，此序或許亦以自況。元朝末年，江西餘干士人葉華卿曾在宅第中修築蘭隱亭，藝蘭百本於樓下，「當春日始和，東風颺颺動人，蘭於斯時，玉茁其芽，而紫蕊翹然其顛，清馨襲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其後十年，天下大亂，華卿全家避往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年。及至明朝建國，六合廓清，始返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為榴鬣」，華卿悲傷如失良友。⁵

明代士人癡情於蘭花者亦不少，於此僅舉一例。萬曆四十七年 (1619) 二月二日，張子薪、朱爾凝、江君長三人，夜宿在嘉定李流芳 (1575-1629) 家中，盆中蘭花恰巧綻開，遂移出來共賞，張子薪素有花癖，「燒燭照之，嘖嘖不已」，

¹ 舒迎瀾，《古代花卉》（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頁 256。

² 吳應祥，〈蘭花史話〉，《世界農業》1983.11：48。

³ 舒迎瀾，《古代花卉》，頁 254。

⁴ 宋·李綱，《梁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幽蘭賦并序〉，頁 508。

⁵ 明·宋濂著，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三九，〈蘭隱亭記〉，頁 1120。

說蘭花雖僅數莖，「然參差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黃、或紫、或碧、或素，其狀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或平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如就，或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莊，或倚而如困，或羣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⁶ 張子薪對於蘭花的觀察實已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狂戀與癡迷狀態。

進入清代，士大夫喜愛蘭花極為普遍。江浙以外的例子，如康熙初年，江西士人吳宗，晚年有目疾，而酷愛福建延平、建寧所產的蘭花。花開時，常常找邵至賢清歌，讓書僮俞仲相和，「至於徘徊離襪之際，未嘗不叩几稱善，而遂以忘其目之眚也」。⁷ 至於華北地區，蘭花一向不多，且不容易種植，故北方人一旦有機會到南方，多半會栽植蘭花賞玩。康熙十餘年，王令（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人）出任廣東驛鹽道及按察使，在廣州就置有蘭吏專事種蘭，所種計有建蘭、汀蘭、鴉蘭（丫蘭）、瓊蘭、樹蘭、風蘭等品種，蘭吏並將這些蘭花畫成蘭譜。⁸

中國幅員遼闊，從溫帶到熱帶均有蘭花，其中不乏大花的品種。崇禎十二年（1639），徐弘祖（1586-1641）出遊至雲南西北山區，在遊記上曾提到該處蘭花甚多，以雪蘭、玉蘭為上品；虎頭蘭花最大，容易開花，其葉闊一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餘朵者，花朵大二、三寸，花瓣闊五、六分。⁹ 然而，虎頭蘭花雖大，但卻不入品。雍正年間，納蘭常安（1684-1747）出任雲南按察使與布政使，有人告知「滇中蘭有百種」，他所目睹者約三十餘種，其中雪蘭、密蘭、硃蘭、綠蘭，俱有詩詠之；他還提到：「滇中有虎頭蘭，亦無香，甚大，生於路畔，如北方之馬蘭，處處皆有，人賤之。其名虎頭者，亦以其形似虎頭也。」¹⁰ 嘉慶初年，桂馥（1736-1805）出任雲南永昌府永平知縣，訪蘭得卅餘種，計春天開者十二，夏天開者六，秋天開者六，冬天開者十，其中虎頭花最大，花品亦最

⁶ 明·李流芳，《檀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二，〈跋盆蘭卷〉，頁399-400。

⁷ 清·儲大文，《存研樓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三，〈文學吳伊蒿傳〉，頁299。

⁸ 清·王令，《古雪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一，〈《古雪堂蘭譜》序〉，頁166-167。

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七上，〈滇遊日記六〉，「己卯正月十一日」，頁851。

¹⁰ 清·納蘭常安，《宦遊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三五，〈雲南·蘭〉，頁1750-1751。

下；四時開者為素心蘭，另又有風蘭、鸞絲蘭、蝴蝶蘭。¹¹ 不過，中國人一向偏愛小花、素淡、清香的地生蘭，與西方喜歡大花的雜交品種大異其趣。¹² 因此，熱帶的品種（如雲南的虎頭蘭、蝴蝶蘭），其花蕊雖大而無香，在明清蘭花品賞文化中並不討喜。

明中葉以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社會上各種逾越定制的現象不斷出現，除在食衣住行等方面較前奢侈之外，對各種品物的消費也日益昌盛，這種情況在江浙地區特別明顯。¹³ 其中，上海士人陸楫（1515-1552）的〈奢侈辨〉特別受到學者的注意，並將其與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的《蜜蜂寓言》相對照。¹⁴ 以往學界探討明清社會的崇奢現象，主要集中在食衣住行與旅遊等方面。¹⁵ 而涉及特定品物的鑑賞，則其研究相對較少。晚明以降，江浙士人與商人對於品物的消費，尤其呈現在「玩物」之風上，舉凡骨董、字畫

¹¹ 清·桂馥著，趙智海點校，《札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〇，〈滇遊續筆·蘭〉，頁402-403。

¹² 陳心啟、吉古和，《中國蘭花全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8），頁71。

¹³ 徐泓，〈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24（1986）：83-110；〈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37-159；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黃敬斌，《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¹⁴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07-109；Lien-sheng Yang（楊聯陞），“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957）：50-52；中譯見陳國棟譯，〈侈靡論——傳統中國一種不尋常的思想〉，楊聯陞，《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186-188；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師大歷史學報》19（1991）：219-234；〈陸楫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新史學》5.1（1994）：131-153；〈《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121-134；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5.2（1994）：159-179。

¹⁵ 相關研究討論參見：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史研究通訊》4（2001）：9-19；鈔曉鴻，〈近二十年來有關明清「奢靡」之風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74（2001）：9-20；常建華，〈舊領域與新視野：從風俗論看明清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447-477；〈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史學集刊》2014.3：95-110；王鴻泰，〈從經濟民到聲色犬馬——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Ming Studies》63（2011）：18-37。

等感官賞玩，無不極力講求，而此也是晚近學者討論的重要主題。¹⁶ 實際上，士人之玩物也包括品賞花卉在內，明清詩文集中相關的記述不勝枚舉。¹⁷

花卉是一種特殊的商品，¹⁸ 與鹽、米、布、茶等生活必需品不同。就像喜愛骨董或字畫一樣，鍾情於花卉者也是「小眾」的消費群。不過，與其他地區相比，明清的江南地區，由於文人、富人、妓女多，加上節慶、交際、休閒活動頻繁，對於花卉的需求較大。因此，許多大的城市，如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上海，在城市外圍出現了專業化的園藝種植。另外，許多專事栽培特種花卉的花匠，為了招徠上階層客人光顧，以賺取更大利潤，無不尋求技術上的革新與品種改良。十八世紀末，揚州、蘇州等地出現了塘花法，上海在十九世紀也隨之跟進。原在春天才開花的許多花卉，透過此一技術，可於農曆春節前後上市，成為大家競相選購的商品。在市場交易方面，江南區域內的貿易網絡，以蘇州為中心，西北至南京，北至揚州，西南至杭州，成為一個涵蓋二百五十公里的市場圈。花卉的交易主要透過水路，船隻扮演重要角色，清代花農甚至利用夜航船載花入城售賣。明清江南的花卉交易，呈現的是蜘蛛網式的交織。¹⁹ 以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角——蘭花——而言，其情況亦不例外。

截至目前為止，在中國花卉史相關著作中，雖有若干學者論及蘭花，但比較偏重的是栽培技術的變遷，²⁰ 其與社會史、經濟史等面向的結合不深，故明清蘭

¹⁶ 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Ginger Cheng-Chi Hsü (徐澄祺),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鴻泰, 〈閒情雅致——明清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 《故宮學術季刊》22.1 (2004): 69-97; 〈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 《新史學》17.4 (2006): 73-144; 張長虹, 《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¹⁷ 邱仲麟, 〈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 《淡江史學》18 (2007): 75-108; 〈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盆景與瓶花之賞玩〉, 《九州學林》5.4 (2007): 120-166。

¹⁸ 明代以前花卉的生產與消費, 參見魏華仙, 《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與消費研究》(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6), 頁 185-240。

¹⁹ 邱仲麟, 〈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城市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3 (2007): 473-528; 另可參見宋立中, 〈論明清江南鮮花消費及其社會經濟意義〉,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9.3 (2007): 45-53。

²⁰ 吳應祥, 《中國蘭花》(北京：林業出版社, 1991), 頁 1-6; 〈蘭花史話〉, 頁 48-50, 16; 辛齊, 〈話中國蘭花〉, 《生命世界》1988.6: 42-44; 舒迎瀾, 《古代花卉》, 頁 251-264; 〈清代江浙滬之蘭蕙花市與花會〉, 《園林》2007.1: 38-39; 何光岳, 〈都梁

花的歷史仍有不少可再探索的空間。前此，筆者曾撰文考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地、輸出及移地栽植的情況，並討論江南士人對建蘭的品賞與標榜。²¹ 另又以江南為中心，討論明清江南的蘭花業與貿易圈，探析蘭花的採集、栽培、貿易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互動。²² 而本文的主軸，則是其社會面向，即江浙地區蘭花鑑賞的多元發展，如士商的雅俗分化，與蘭蕙圖譜、蘭花會之出現，以及價格炒作、交易詐騙等現象，均在探究之列。

一·蘭癡：愛蘭成癖

英文的蘭花 orchid 一詞，源自希臘文 orchis，意為睪丸 (testis)，係因地中海地區若干蘭種的球莖看起來像睪丸而得名。而在西方早期，其根莖被當作治療與性方面有關的藥物，花朵本身反而不受重視。²³ 長期以來，西方將性能力、生育力、性徵等，與這種植物連繫在一起。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1837-1901) 的 John Ruskin (1819-1900)，還叫這種花是「好色的妖精」(prurient apparitions)。²⁴ 英國小說家 Susan Orlean 在《蘭花賊》中，則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西方「不管是繁殖蘭花的人、植物學家、採蘭人或是蒐集蘭花的人，清一色是男性。維多利亞

考——兼談蘭類作物的作用》，《農業考古》1993.1：63-72；陳心啟、吉古和，《中國蘭花全書》，頁 1-10；〈蘭花文化和歷史〉，《森林與人類》2004.5：58-60；周建忠，〈蘭花栽培歷史考述兼釋《楚辭》之「蘭」〉，《雲夢學刊》1998.3：1-10；盧小明，〈蘭花叢考〉，《農業考古》2000.1：276-278, 280；葉軍然，《江浙春蕙蘭欣賞與鑒別》（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頁 6-13。

²¹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387-440。

²² 邱仲麟，〈明清社會的蘭花狂熱——以江南為中心的考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合辦，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Market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zi Delt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pace,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10.5-6）；〈採集、栽培與交易——明清江南的蘭花業與貿易圈〉，上海師範大學近代社會研究中心編，《情緣江南：唐力行教授七十華誕慶壽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2014），頁 391-419。

²³ Merle A. Reinikka, *A History of the Orchid* (Miami: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2), pp. 3-4.

²⁴ "The Orchid in the Human Imagination," <http://depts.washington.edu/popctr/orchids.htm> (瀏覽 2011.12.09)。

時代的女人不准種植蘭花，因為當時人認為花朵的形狀具有高度性暗示的意味，不利於女性嬌羞的氣質」。²⁵

我們不知道這種形貌的想像是否存在於中國，但可以了解的是：漢代以來，並不存在女人不宜養蘭的禁忌。西漢時，劉安 (179-122 BC)《淮南子》就說「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²⁶ 至明代，謝肇淛 (福州府長樂縣人，1567-1626) 指出：「《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又說：蘭花在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²⁷ 王象晉 (濟南府新城縣人，1561-1653) 也有「蘭性喜陰，女子同種則香」之語。²⁸ 清朝初年，冒襄 (揚州府如皋縣人，1611-1693) 則提到：「蘭待女子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宜男草是其絕對也。又聞蘭不經女子膏沐手，雖香不芳」。²⁹ 而屈大均 (廣州府番禺縣人，1630-1696) 亦云：「蘭又女類，故男子樹之不芳。草木之性，惟蘭宜女子樹之」。³⁰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明清士人依然認為蘭花原本即與女性相宜。

蘭花好淫——喜歡女性柔荑撫摸之說——自非其天生本質，而是文士所創造、所賦予。但在明清時期，確實不乏女子藝蘭的例子。在江浙以外者，如鍾惺 (湖廣承天府竟陵縣人，1574-1624)〈新姬手植盆蘭引〉談到他小妾喜愛蘭花，常將其擺在閨房中：「國香本自房中物，歲植牀邊獨浣拂」。³¹ 彭士望 (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1610-1683) 之妻朱宜人 (1613-1667) 性尤愛花，明清鼎革後，家中經濟貧困，常於破缶敗管中尋覓花種，按時灌溉。花開時，持著茶杯，往往流連多時。後隨夫婿回到江西翠微山，轎中看見農夫拿著山蘭，急忙湊錢買下，帶上

²⁵ Susan Orlean 著，宋瑛堂譯，《蘭花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 78。

²⁶ 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一〇，〈繆稱訓〉，頁 327。

²⁷ 明·謝肇淛著，印曉峰點校，《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一〇，〈物部二〉，頁 199。

²⁸ 明·王象晉著，伊欽恒註釋，《群芳譜詮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花譜·蘭〉，頁 258。

²⁹ 清·冒襄，《巢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五，〈蘭言〉，頁 611。

³⁰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七，〈草語·蘭〉，頁 692。

³¹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五，〈新姬手植盆蘭引〉，頁 64。

山中種植。逝世後殯殮，家人皆環蘭花而哭，遂將其置於靈几上。³² 江浙地區的例子更多，如張鳳翼（蘇州府長洲縣人，1550-1636）有〈詠美人培蘭〉詩云：「金沙淨土護雲根，淺撥輕培玉笋痕。」³³ 述說的是女性以手培土養蘭的景象。冒襄在《影梅庵憶語》也記載董小宛（1624-1651）在閨房中蓄養春蘭、九節蘭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又以碧箋手錄〈藝蘭十二月歌〉，黏貼於牆壁上。但在她病死後，蘭花枯萎過半。³⁴ 另外，毛奇齡（紹興府蕭山縣人，1623-1716）的女弟子徐昭華（紹興府上虞縣人），亦「雅好蒔蘭，因自號蘭癡」。³⁵ 陸繼輅（常州府陽湖縣人，1772-1834）之母林桂（1735-1809）也喜愛養蘭，皆親手灌溉，有素心、蓮瓣、並蒂諸種。³⁶

士大夫還將蘭花與女性貞節連結在一起。清初徽州府歙縣吳節婦，年二十六守寡，五十歲生日時，所居清越堂前的蘭花，「一苞四花，色香迥異」。六十歲生日時，「蘭穗復抽莖，高三寸許，萼凡八，並枝吐秀，榮於顛者韡韡」。李麟（1634-1710）在〈清越堂蘭記〉論道：「蘭之生也，恆於山谷，花中之最幽潔者，其香又靜而久，天殆以旌節婦幽潔之操，且告人以仁者靜靜必壽也」。³⁷ 這個例子雖不在江浙，但類似的思維應有跨地域性。

清代社會不僅女性有蘭癡，男子更是多不勝數。如李漁（1610-1680）即善於培養蘭蕙，他在《閒情偶寄》談到箇中心得，其論蕙指出：「人謂蕙之花不如蘭，其香亦遜，吾謂蕙誠遜蘭，但其所以遜蘭者，不在花與香，而在葉」；因此，「善用蕙者，全在留花去葉，痛加剪除，擇其稍狹而近弱者十存二三，又皆截之使短，去兩角而尖之，使與蘭葉相若，則是變蕙成蘭，而與強幹弱枝之道合矣」。³⁸ 其論品賞蘭花，則側重在如何保留香氣於室中，即聞香之法：

³²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點校，《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外篇，卷一八，〈彭母朱宜人墓誌銘〉，頁908-909。

³³ 明·張鳳翼，《處實堂續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九，〈詠美人培蘭〉，頁579。

³⁴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241。

³⁵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二九，〈名媛詩·徐都講〉，頁615。

³⁶ 清·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二〇，〈先太孺人年譜〉，頁50。

³⁷ 清·李麟，《虬峰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八，〈清越堂蘭記〉，頁632。

³⁸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1990），卷一四，〈種植部·蕙〉，頁303-304。

蘭之初著花時，自應易其座位，外者內之，遠者近之，卑者尊之，……居處一定，則當美其供設，書畫、爐餅，種種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即謝，匪妒也。此花性類神仙，怕親煙火，非忌香也，忌煙火耳。若是則位置提防之道得矣。然皆情耳，非法也。法則專為聞香，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則後來之香倍乎前矣。故有蘭之室，不應久坐，另設無蘭者一間，以作退步，時退時進，進多退少，則刻刻有香，雖坐無蘭之室，若依倩女之魂。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有此室，則以門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畢而入，以無意得之者，其香更甚。此予消受蘭香之訣，秘之終身，而泄于一旦，殊可惜也。³⁹

李漁對於花香特別注重，因此分設有蘭之室與無蘭之室，透過兩相懸殊的反差，使嗅覺的敏感度增加，以便充分吸取蘭花的香氣，其對蘭香的體驗亦可謂極致。《閒情偶寄》又云：「此法不止消受蘭香，凡屬有花房舍，皆應若是，即焚香之室亦然。久坐其間，與未嘗焚香者等也。門上布簾，必不可少，護持香氣，全賴乎此。若止靠門扇關閉，則門開盡泄，無復一線之留矣。」⁴⁰ 這種對蘭花香的癡情，亦見於陽湖名史家趙翼（1727-1814）身上。嘉慶十一年（1806），其〈建蘭〉詩說道：「何物能消暑，盆花發建蘭。品如人雅淡，香在戶開關。」〈盆蘭大開適近余臥榻戲作〉也提到：「甕斗齊開十箭鮮，紗廚恰伴我孤眠。五更忽作風流夢，何處蘭芬到枕邊。」⁴¹

而即使旅居外地，對於家中的蘭花還是無法忘情，如陳梓（紹興府餘姚縣人，1683-1759）在〈寄女含芝〉詩中，就叮嚀女兒要好好照顧蘭花：「江頭寒食柳絲斜，身在家鄉日憶家。雙鯉迢迢無別語，丁寧第一護蘭花。」⁴² 有些愛蘭者對蘭花的照顧是無微不至，連罩子的材質都極為講究。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就記載：

蘭蕙有罩，如人端居華屋，精采煥發。用湘竹妃、香楠木為上，鴻鵠木、

³⁹ 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一四，〈種植部·蘭〉，頁302-303。

⁴⁰ 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一四，〈種植部·蘭〉，頁303。

⁴¹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四八，〈建蘭〉、〈盆蘭大開適近余臥榻戲作〉，頁1235。

⁴² 清·陳梓，《刪後詩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九，〈寄女含芝〉，頁196。

水黃楊次之，紫檀、紅木未免烟火氣。四面隔護之，紗宜用輕綃，頂重漆紗足矣。⁴³

實際的例子，如錢塘張雲璈（1747-1829）曾將五盆建蘭寄至秋雨菴，託鑑塘上人收養，詩中提到「飾以紅雕蘭，護之碧紗幌」。⁴⁴而他的朋友嵇贊府也喜愛蘭花，所購數十盆，皆是名貴品種，且親自培植，絕不假手奴僕，「春時方寒，置密室中，猶懼其凍，熾炭於旁，不敢施勺水，箭纔寸許，慮其或僵也，時以指消息之」。⁴⁵另外，乾隆年間，錢塘生員高繩武，「平生愛蘭，藝蘭數十百盆，手自灌，人呼為蘭癖」。⁴⁶松江府婁縣士人潘兆鸞（1747-1815），五歲得軟腳病，致成殘廢，遂放棄科舉，創作詩文，旁及醫卜。平時常閉戶，家中養蘭百本，自號蘭孩子。⁴⁷

揚州林蘇門（1748-1809）自號蘭癡，是蘭花的狂熱者之一。他說福建龍巖所產的建蘭，花開每幹九枝、十枝居多，即使非素心蘭，蘭品已是最上，比起江西的贛州蘭，不啻天壤之別。乾隆末年，林蘇門住在外甥阮元（1764-1849）浙江巡撫官署，購得春蘭二百餘盆，品種如梅瓣、荷瓣、水仙瓣、白果瓣之類，而以紹興會稽山所出之玉瓣紅舌者最耐人尋味，但一直以未能獲得福建素心蘭為憾。嘉慶十三年（1808），阮元再撫浙江，福建上杭縣令穆明阿獲知林蘇門愛蘭，承諾送其龍巖素心蘭，讓他相當高興，嘗賦詩云：「蘭種爭誇佩最良，龍巖尤自壓羣芳。春光九十秋來占，願把冰心托素王。」⁴⁸但最後不知是否如願以償。

嘉道年間，江陰縣監生何彥猗的父親亦喜愛蘭花，庭中栽植了百餘盆。⁴⁹約

⁴³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收入莫磊選編，《蘭花古籍擷萃》〔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第1種），卷三，〈防護〉，頁59。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收入佚名輯，《海天秋色譜等六種》）文字略有不同：「蘭蕙有罩，如人端居華屋，精采煥發。用湘竹妃、香楠木為上，鸚鵡木、水黃楊次之，紫檀、紅木未免烟火氣。四隔護之，紗宜輕綃也。」

⁴⁴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六，〈以建蘭五盆寄秋雨菴託鑑塘上人收護因系以詩〉，頁492。

⁴⁵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卷八，〈養蘭說〉，頁226。

⁴⁶ 清·法式善，《梧門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六，頁97。

⁴⁷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編年文續彙，〈例授登仕郎晉封奉直大夫潘君墓誌銘〉，頁399。

⁴⁸ 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七，〈趨時清賞·素心蘭雅愛龍巖〉，頁279-281。

⁴⁹ 清·袁翼，《遠懷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哀忠集初編，〈江陰縣監生湘人何君〉，頁600。

略同時，嘉興府嘉善縣人程文杞，「性嗜蘭蕙，著《蘭蕙論略》、《藝蘭書屋詩草》」。⁵⁰ 浙江永康縣人胡鳳丹（1828-1889）也談到其祖父喜愛蘭蕙，「羅列堂前，芬芳競秀，其間開九瓣蘭者一，開並蒂蘭者二」。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初，蘭花盛開，其祖父下階採取，不慎失足倒地，左腳經醫生治療兩月餘才好，然而年逾八旬，自此精血虧耗。⁵¹ 晚清時，寶山縣羅溪世家之子朱鑑和，其父在城外築有別墅，他在別墅種了許多花草，「而蘭尤富」。蘭之品種，素心者為上，紫心者次之，並蒂者尤不易見。別墅中素心蘭僅有一盆，特別受到珍愛。⁵²

更有甚者，出行在外亦必攜蘭相伴。錢陳羣（1686-1774）曾記到一位王姓知府，奉命前往川藏之間的打箭爐辦事，於山下看見一素心蘭，將其納入行擔中，每當驛站休息，必置蘭花於坐旁，「相對而笑，或酌以酒」。二年事竣，回到常熟，「種之得地，蘭大茂，蓋自中土所種皆不及」。⁵³ 另外，錢塘章廷彥嗜蘭成癖，咸豐十、十一年間（1860-1861），太平天國攻佔杭州等地，「航海避兵，猶攜蘭入北，中遭海盜，盡喪資」。⁵⁴

有些深愛蘭花的狂熱者，還親自上山訪蘭。光緒十年（1884），《申報》曾報導：蕭山某君素愛幽蘭，名種如檀心、梅瓣，羅列於磁盆中，「苟聞某地產一異花，雖水遠山遙不憚，裹糧而往」。⁵⁵

蘭癡遇上蘭花折損，常是痛心疾首。如杭州湖墅之魏敦甫，性嗜蘭蕙，手種佳種甚多，春素荷一種，尤受珍愛。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嚴寒十餘日，敦甫將此花藏於枕邊，以為如此即不致受凍。不料至春初，已是根空葉萎，其他佳種竟也片葉無存。為此如喪考妣，大哭一場。⁵⁶ 而無意間獲得佳種，又要大肆慶祝。光

⁵⁰ 清·江峰青、顧福仁等修纂，光緒《重修嘉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二三，〈人物志五·行誼下·國朝〉，頁450。

⁵¹ 清·胡鳳丹，《退補齋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六，〈病中述病記〉，頁344。

⁵²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五，〈痴蘭院主〉，頁351。

⁵³ 清·錢陳羣，《香樹齋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五，〈題王明府所畫素蘭圖有序〉，頁196。

⁵⁴ 徐珂編著，《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2冊，〈植物類·章子辛嗜蘭成癖〉，頁5799。

⁵⁵ 申報社編，《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光緒十年七月廿三日，〈尋獲古礦〉，頁2。

⁵⁶ 吳恩元，《蘭蕙小史》（收入牟安祥，《蘭蕙小史名品賞析》〔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附錄），附卷，〈紀事〉，頁318。

邱仲麟

緒二十一年，《點石齋畫報》報導：金陵青溪某寓公偶然購得蕙蘭數盆，含葩諸蒂似與凡品不同，及至其盛開，果然一花九瓣，共開六莖，花皆並蒂，花瓣作玻璃色，花心作淡黃色，「幽香馥郁，實為絕無僅有之物」。主人翁於無意中得此佳種，欣喜莫名，遂備辦酒餚，遍邀親友共賞奇葩。⁵⁷（參見圖一）

光緒年間，杭州有祭花室主人邵芝巖，極愛蘭花，室中及庭中分列百餘盆，其中多有異種，而素心蘭與連理蘭遂成常品。同治十二年（1873），譚獻（1832-1901）詢問這些蘭花的來源，邵芝巖說皆得自西湖附近諸山中。⁵⁸ 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申報》的一則報導談到杭州有某人獲得一蘭，攜至三元坊邵芝巖筆店，店主邵芝巖素以蘭癖著名，出價洋圓一元五角，不讓；再攜至下珠寶巷富織署經承之高某家中，高某認為是稀世珍寶，於是出價洋圓四元購下，「盛以白玉磁盆，培以金砂泥，盛以紫檀雕刻盆架，圍以琉璃屏風」。⁵⁹ 就此而言，下珠寶巷之高某似乎更捨得出價購買佳蘭。

據楊鹿鳴《蘭言四種》云：清末民初，江南養蘭名家有無錫楊幹卿、杭州吳恩元、江寧鄭寶慈。另外，江寧有數位外地寓居者，「雅具蘭癖，藝蘭特茂」。其一為歙縣人張玉夫，自卸職後閉門種花，「蘭多殊品，花開俱奕奕有神」，他曾說：「我以身為花奴，花之精神，所以報我也。」其次為直隸人孟竹菴，「自闢小園，頗具幽趣，種蘭近百盆，風雨朝夕，自運出入」。其三，鐵柵池（地名）有歸安人丁少蘭寓館，所養蘭花都是閩粵名貴品種，「盆架整齊，每品數十盆，異常修潔，其中虫素，不克殫述，一大觀也」。⁶⁰

二·採蘭人、蘭花匠與蘭花市

明清江南人士喜歡蘭花，類似一種時尚（fashion），而建蘭是其中的名牌商品。早在宋代，福建蘭花已經進貢入宮，而建蘭、漳蘭也漸成眾所矚目的對象。明代以降，福建的蘭花更成為江南的熱門花卉。江南人士所以爭相購買建蘭，乃

⁵⁷ 清·吳友如等繪，張奇明主編，《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第12冊，圖117，〈香生九畹〉。

⁵⁸ 清·譚獻著，范旭倉、牟小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卷三，頁57。

⁵⁹ 《申報》光緒十九年二月廿二日，〈奇花有主〉，頁1。

⁶⁰ 楊鹿鳴，《蘭言四種》（民國鉛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藝蘭瑣言〉，頁17b, 18a。

在於其除了花色、花香勝出之外，還有花蕊多、葉挺直等特點，明顯超越本地的興蘭、杭蘭，而江西的贛蘭也無法與其相比。⁶¹（參見圖二）

另一方面，江浙藝蘭者還熱衷於建蘭的栽培。為取得培植經驗，首先是重尋舊存的相關知識，此即周履靖、高濂等人新刊南宋的《金漳蘭譜》與《王氏蘭譜》；其次是引進福建當地的栽培技巧，故在十六世紀以後，江南出現了〈培蘭四戒〉與十二月〈護蘭詩訣〉；再者即是將親身經驗撰述成書，而此即《羅鍾齋蘭譜》的出版。隨後，養蘭歌訣與詩訣不斷出現在花卉譜錄與農書中，清初又有《蘭易》與《蘭史》。清代建蘭栽培祕訣的不斷複製，與培植經驗的持續傳播，呈現出江南人士對建蘭的熱愛一直未減。⁶²

清朝初年，山陰張岱（1597-1685）在《陶庵夢憶》談到范與蘭家中，有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簸箕，「早昇而入，夜昇而出者，夏也；早昇而出，夜昇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開時，「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⁶³魯雲谷則擁有名貴的福建魚魷蘭，張岱在文章中稱道他擅長培養，「見花色笑通花語，冷暖燥濕無纖差」。康熙二年（1663）六月，「培法既精本日茂，小盆盛發十九葩」，張岱與他聞著蘭花香氣，整日泡茶聊天。⁶⁴周亮工（1612-1672）也曾得到閩蘭異種魚魷，還向福建人誇耀。⁶⁵這一蓄養建蘭的風氣頗盛，故康熙年間程哲有「今江南好事家，多收蓄閩蘭貴種」之語。⁶⁶

不過，清中葉以後，江浙地區的蘭蕙著述出現「在地化」的現象。據學者統計，民國以前的蘭譜約有三十五部，其中宋代二部，明代五部，清代有二十六部。特別的是，嘉慶以後出版的蘭譜甚多，如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屠用寧《蘭蕙鏡》及《蘭譜》、吳傳澐《藝蘭要訣》、方時軒（1773-?）《樹蕙編》、張光照《興蘭譜略》、劉文淇（1789-1854）《藝蘭記》、杜文瀾（1815-1881）《藝蘭四說》、許鼎鈸（1834-1911）《蘭蕙同心錄》、袁世俊《蘭言述略》、岳梁《養

⁶¹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頁 390-391。

⁶²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頁 407-415, 425-428。

⁶³ 清·張岱著，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八，〈范與蘭〉，頁 74-75。

⁶⁴ 清·張岱著，夏咸淳點校，《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張子詩牋，卷三，〈癸卯六月魯雲谷魚魷蘭盛開茶話終日賦謝〉，頁 56。

⁶⁵ 清·周亮工，《閩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一，〈魚魷嬌〉，頁 20-21。

⁶⁶ 清·程哲，《蓉槎蠹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二，頁 276。

蘭說》、佚名《蘭蕙真傳》、王璧《藝蘭說》、苕溪花叟《養蘭說》、區金策《嶺海蘭言》。⁶⁷ 而在這些蘭譜之中，除岳梁《養蘭說》專言北京，區金策《嶺海蘭言》獨論廣東之外，絕大部份為江浙人士所著，而且所論主要均為江浙的蘭蕙及其栽培法。因此，民初楊鹿鳴曾云：「藝蘭有譜，以建蘭及江浙蘭譜最多。若江西之贛蘭、楚北之鄂蘭、雲南之滇蘭，花多殊品，散見於各家雜著中，獨未見有譜。」⁶⁸

清代江浙市面上的蘭花，主要來自外來與本地兩個系統。而本地的蘭蕙又分為兩類，其一為山樵或採花人所採下的野生蘭，又稱「山蘭」；其二則係花匠將山蘭移植、分栽的「家蘭」，實即次生蘭。至於用種子繁殖，雖然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識》已經提到：「蘭結子曰蘭筍，長房八棱，秋霜裂而子飛去，預護之熟，亦可種也。」⁶⁹ 但以種子栽培，不穩定性太高，明清花匠甚少為之。

野生蘭花生長之處，多在溪澗幽谷之區，非熟悉山勢者不能尋獲。實際上，上山採蘭相當危險。嘉慶年間，張光照《興蘭譜略》就說：「蘭產雖近，而採者動以性命為殉，論者比之吉林刨參焉」。宜興縣南鄉近山數十村，村人多半世代以採蘭為業，「冬月間結伴，裹百日糧」，由長興、廣德、寧國等地向南推進，「窮搜山谷中，遠至千里，近亦不減三、四百里」。採蘭者所帶器具為小鴉鋤、平頭小鏟、鐮、鋸各一、竹筐二、麻繩粗細各一、篠竿一、鐵勾大小各一。充饑的乾糧，則預估入山之深淺與遠近，挑擔入山。一起入山的採蘭人，「始聚而終分，約曠黑會某所」。會合之後，清查人數，若未全到，則非被虎狼吃掉，即摔落窮岩絕壁之下。搜尋者僅能以遺物判斷，罕能見到遺體。由於蘭多產於懸崖斷壑，「山愈高則產愈多，境愈嶮則種愈奇」，道路不通，則斬棘開道，「斧木梯援，遙飛索罣于喬柯，絙懸上下，復以竹竿挑引鉤距」，一失手即粉身碎骨。蘭之單枝獨葉者，常生於石罅樹根，須用鴉嘴鋤連土挖取。連生數十百本者，往往產於高山平頂之上，則用鏟全部掘起，不敢傷其根，稍微撥去根上泥土，裝入竹篋中，以便擔運下山。而彼處山民知曉南鄉有採蘭人，常預先入山搜尋蘭花待售，故南鄉前往採蘭者必多帶一點錢，全數將其買下運歸，這比起自行採取，在勞逸上相差甚遠，多者甚至可獲得數十簍。即至臘末春初，山雪消融時，「則縛

⁶⁷ 周肇基、魏露苓，〈中國古代蘭譜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8.1：69-72。

⁶⁸ 楊鹿鳴，《蘭言四種·藝蘭瑣言》，頁13a。

⁶⁹ 舒迎瀾，《古代花卉》，頁263。

竹為槌，浮簍而出，如自寶山回矣」。歸家後再仔細挑揀，按照枝葉、殼色臆測高下，「其高者，炫諸養蘭家，論議紛然，金注瓦注，等於射覆」；其劣者，每日挑兩簍至蛟橋之南出售，「晴日烘蒸，香聞數里，為吾邑勝事」。⁷⁰而實際上，經過採蘭人不斷搜掘，宜興山區的野生佳蘭已日漸稀少。嘉慶元年（1796），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就指出：「近來出蘭蕙處，攜販至蘇門者，徽、浙居多。其各山採產無常，或此山竭取，復至他山，搜羅殆徧。近如陽羨山中，則鮮好花。」⁷¹

採蘭人在江南周邊山區所採集的野生蘭花，可能自行留下佳種進行分栽，養至固定時間後售出。清代江南的蘭花栽培中心，前期以宜興、常熟為著。清中葉以後，則轉移至浙江餘姚。⁷²餘姚培育蘭花，興起於嘉慶年間，當時張應位專收美種，「藝蘭為生，如法種之，培養盡善」。而在道光年間，有徐漢三，亦餘姚人，酷愛蘭蕙，「平生盡其所長，當時頗以為能，然究其栽養之法，亦無他巧，不過順其性以導之爾」。⁷³實際上，餘姚所栽蘭花原不出名，但至咸豐年間，江南因太平天國之亂，各地種株盡遭兵焚而斷絕，而餘姚有人攜其種株避亂，故在亂後其蘭種獨茂而奇貨可居。咸豐十年（1860）以前，餘姚之老種與細種蘭蕙，每年多有載往各處出售者，如富陽張升林向餘姚蘭戶取得蘭蕙往各處販賣；太平天國進入江南後，常蓮元在同治五年（1866）間，往餘姚載出細種至上海，後來黃蔭齋亦載細種至上海，價格較亂前貴了三倍。⁷⁴

光緒初年，袁世俊嘗言：「予嘗調藝蘭之法，惟餘姚法最精。從前諸家皆不得其法，太矜貴而偏於陰，故不甚茂。然其法秘而不傳，即鄰縣山陰等處亦皆不知。」後來，栽培法外流，同治初年慈谿縣西鄉人亦能種植，至同治、光緒之際有數家。而在餘姚當地，栽培法轉相傳授，更增至三十餘家。⁷⁵有趣的是，居住在嘉興府秀水縣的杜文瀾，某年春天夏蘭開花時，曾請袁憶江（可能是袁世俊）

⁷⁰ 清·張光照，《興蘭譜略》（清嘉慶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二之採〉，頁9a-10b。

⁷¹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清嘉慶元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四，〈引證〉，頁2b。按該館所藏係殘本，僅有第四卷。

⁷² 邱仲麟，〈採集、栽培與交易〉，頁404。

⁷³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臺北：廣文書局，1976），卷一，〈本性〉，頁14。

⁷⁴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61-62。

⁷⁵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首，〈藝蘭總說〉，頁5-6；卷四，〈附錄〉，頁68。

以餘姚栽培法督率園丁翻種。⁷⁶ 餘姚花匠賣出的蘭花，以花部計價，據杜文瀾《藝蘭四說》指出：

近有浙之餘姚人，獨得種植法，數十家蒔蘭蕙為業，所售佳花，以葉定價，每蘭一叢，或三、四葉，或五、六葉，為一部。每部價昂者，值番餅五、六十枚，少則二、三枚，初不問花之多寡也。⁷⁷

袁世俊《蘭言述略》則言：餘姚「所售佳花，以葉定價，蘭合足五大瓣為一部，蕙合足七大瓣為一部，只須有花，不問花之多寡也。」⁷⁸ 但在藝蘭界，對於餘姚花匠似乎另有評價。民國初年，楊鹿鳴在江蘇圖書館見到一部《蘭蕙說》抄本，作者為餘姚某氏，書末黏有一跋，內言：「餘姚種蘭，術多詭譎。」他覺得此語「誠知言者，惜亦未書姓名」。⁷⁹

在蘭花交易方面，清代江浙各地的蘭花貿易，最小的交易單位應該是在山下或是河口。以宜興為例，當地人採到蘭花之後，有時即在交通線上發售。乾隆末年，錢維喬 (1739-1806) 出遊太湖途中，舟泊於烏溪，曾經「就道左買蘭，土人別其種類，云產本山者佳，他者率臭」。⁸⁰ 這是一種小型的蘭花市集。

更上一層，則是城市的花卉市場。許多採蘭人採到蘭花後，即挑運至城市出售，故各縣城都有蘭花市場。如宜興縣城外的蛟橋，就是蘭花的重要集散地，陸繼輅 (1772-1834) 即記載：「春月賣蘭者，皆集蛟橋，無慮數萬本」。⁸¹ 乾嘉年間，朱實發在湖州府武康縣，亦有詩述及蘭市：「此間爛賤是蘭花，三百青錢買一車。」又云：「蘭花此地多於草，捆載牛腰販市場。」⁸² 另外，光緒二十一年 (1895)，《點石齋畫報》曾經報導：「金陵自入春以來，街市間擔售蘭蕙者，幾至賤同蕭艾。都人士貪其價廉，莫不購致數莖以備芸窗清玩。」⁸³ 但據楊鹿鳴《蘭言四種》記載，晚清金陵的蘭花主要來自外地：「寧垣之蘭，春蘭多來自茅

⁷⁶ 清·杜文瀾，《采香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四，〈巫山一段雲〉，頁30-31。

⁷⁷ 清·杜文瀾，《藝蘭四說》（臺北：華文書局，1969），〈品類說〉，頁1044。

⁷⁸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68。

⁷⁹ 楊鹿鳴，《蘭言四種·評蘭瑣言》，頁12b。

⁸⁰ 清·錢維喬，《竹初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四，〈舟泊烏溪就道左買蘭土人別其種類云產本山者佳他者率臭嗟乎蘭即不齊乃有臭乎感采佩之非人傷幽芳之易落物之蒙於知而不知者即蘭可知已〉，頁57。

⁸¹ 清·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三集》卷一〇，〈歸興八首并序·七〉，頁202。

⁸² 楊鹿鳴，《蘭言四種·詠蘭瑣言》，頁19a。

⁸³ 清·吳友如等，《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第12冊，圖117，〈香生九畹〉。

山，夏蘭多來自安徽，而紹興蘭蕙亦間有至者。」⁸⁴

實際上，江南本地所產蘭花有限，不足以供應當地的消費需求，因此周邊區域所產的蘭花大量輸入。明清江南的蘭花市場，除本地的市場之外，其貿易圈亦有近遠之別，近者如浙江南部與安徽南部，遠者則來自江西與福建等地。盛產蘭花的浙江南部，其與江南市場之間的聯繫極為緊密，也是江南蘭花的主要供應地。整體而言，江南地區由於富貴者捨得花錢購買，蘭花的消費人口眾多，帶動蘭花市場的持續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蘭花消費地。而周邊各省的蘭花也循著錯綜複雜的水道與陸路，匯聚入蘇州、杭州、上海及南京、揚州等地。⁸⁵

在清代，蘇州是江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場，南北各地的花卉齊聚於此。⁸⁶ 乾隆年間，章炳蘭〈游虎丘竹枝詞〉談到市上販售各種花卉，但在詩註中說：「素心蘭，遍覓不得。」⁸⁷ 道光年間，《桐橋倚櫂錄》則記載：虎丘交易的花卉，「有來自南路者，多售於北客；有來自北省者，多售於南人」。這些由南、北各地運來交易的花卉，「必經虎丘花農一番培植，而後捆載往來」。花卉之出入，俱由店主經手。至於春夏蘭蕙、臺灣水仙，則另有專賣店。⁸⁸

上海方面，據咸豐十年（1860）《海陬冶遊錄》記載，花草濱、三牌樓一帶多有花肆，「異蕊名葩，靡月不有」，夏秋之交，「建蘭素蕙，入座清芬」。⁸⁹ 晚清上海則出現福州商人專門經營建蘭買賣。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的《申報》，就有三山主人刊登廣告：「福建素心蘭，向聚新開河福森春團記發售，現移小東門內四牌樓常合泰花園，諸君賜顧，惠臨採擇」。⁹⁰ 最為有趣的是，光緒初年，外國蘭花也進入上海市場。光緒九年，福利公司有廣告云：「新到外國清香蘭花，此花如中國吊蘭無異，香味極雅。因此種花從未到過上海，今特趕緊辦來，應擺元旦之用。又有時式花子及各種菜子，俱是相宜」。⁹¹（參見圖三）此一廣告連續刊登多時，但外國蘭花是否受到歡迎則不可知。

⁸⁴ 楊鹿鳴，《蘭言四種·評蘭瑣言》，頁16b。

⁸⁵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頁415-419；〈採集、栽培與交易〉，頁414-417。

⁸⁶ 邱仲麟，〈花園子與花樹店〉，頁518-521。

⁸⁷ 清·章炳蘭，〈游虎丘竹枝詞〉，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663。

⁸⁸ 清·顧祿著，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櫂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一二，〈園圖〉，頁392。

⁸⁹ 清·玉鮎生，《海陬冶遊錄》（上海：世界書局，1936），卷上，頁4。

⁹⁰ 《申報》光緒十三年四月廿六日，第6版，〈建蘭發售〉。

⁹¹ 《申報》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第4版廣告，〈新到外國蘭花〉。

花匠或商人為了利潤，對於栽植的各個細節，應較文人更加小心。而一年栽培，為的是獲取財物，特別是在年節之時。眾所皆知，春節為中國最大的傳統節慶，蘭花更是士庶所必買，因此是一大利市。有趣的是，為了爭取上市時間，讓蘭花早日開放，以便賺得好價錢，花匠想出特別的辦法。曹溶 (1613-1685)《倦圃蒔植記》記載杭蘭，就提到商人為了賺錢，「置浴室取煖促開，香韻頗減」。⁹² 另外，方薰《太平歡樂圖》提到杭州市上的蘭花，所以在臘月就有人販售，其方法乃是：「以蘭之繁蕊者，攜至煙霞嶺之水樂洞，時層冰寒互，獨洞中氣煖如春，不數日蕊皆花矣。」⁹³ 翟灝 (?-1788)《湖山便覽》亦記載：杭州南山水樂洞，「洞底暖氣氤氳，冬日鬻花人每持蘭往乘之，越宿花即放。」⁹⁴

另外，則是利用塘花法讓花早開。道光年間，顧祿《桐橋倚棹錄》記載：虎丘花農於嚴冬設置窖室，謂之開窖；窖中晝夜爐火不斷，專門溫烘碧桃、玉蘭、水仙、蘭蕙、迎春、郁李、五色牡丹，以備士商、衙署迎接新年玩賞之用，俗呼為窖花。又有屋子安置畏寒花樹，室內的窗縫糊紙，可使溫氣不洩漏，謂之花房。在春分之後，各種花卉移出花房，必須覆蓋蘆簾，「以避風日」。⁹⁵

在江南各地，對特殊品種的蘭蕙，各有不同的稱呼。同治年間，杜文瀾《藝蘭四說》指出：「蘭蕙佳種，稱名各殊，宜興為『蟲種』，無錫為『異種』，常熟為『巧種』，浙江為『細種』，蘇州為『細花』」。⁹⁶

浙江蘭蕙又有「大山」、「中山」、「小山」之別。光緒初年，袁世俊指出：匯集蘇州、上海的新花，以嚴州、富陽運來，花大而色俏者為佳，諸暨、廣德為中等，奉化葉小為下等。蕙花則以處州所出最佳，葉與蕊皆極大，花開也甚大，可惜出產不多；至於龍遊所出產，俗稱「大山頭」，花多出細種；諸暨所出，俗名「中山頭」，花頭不大是中等；新昌出者，俗名「小山頭」，花雖次而小，然細種出者亦甚佳。⁹⁷ 又據近人劉雅農說：上海蘭蕙花品極多，大半依據花

⁹² 清·曹溶，《倦圃蒔植記》（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上，〈花卉一·蘭蕙〉，頁276。

⁹³ 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清光緒重刊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頁12a。

⁹⁴ 清·翟灝，《湖山便覽》（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卷八，〈南山路·九曜山·水樂洞〉，頁623。

⁹⁵ 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二，〈園圃〉，頁392。

⁹⁶ 清·杜文瀾，《藝蘭四說》，〈品類說〉，頁1044。

⁹⁷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二，〈種類〉，頁19-20。

瓣之形意分類，「區以梅、荷、水仙等種，又分老花、新花，皆有定名」。清初以來前人手植名種，一再分根移植者，統稱老花。凡近時發現之品，統稱「新花」，名由花主擬定。但新花不常有，雖有花販從產地運銷到江浙各大城市，每年約可千、百簍，但素心者已屬罕見，更何況佳種？若果獲得上選，即如獲至寶，馬上名聞遐邇。新花於春分前後上市，每簍裝著數十本，每本有艸三、五朵，乃至七、八朵不等，皆含苞待放。精於鑒賞者，看籜壳、色澤、梗葉，不必等到花放，即可辨識是否入品。不入選者，謂之「行花」，多半任意分贈戚友鄰里。⁹⁸

三·價格炒作與蘭蕙圖譜

明清兩代，社會上雖同樣喜愛建蘭，但明代人只要是建蘭就已心滿意足，而清代人更企盼能得到建蘭中的素心蘭，且以龍巖所產者為首選。換言之，龍巖素心蘭更是名牌中的名牌。⁹⁹ 而其在福建當地，價格已經不低。乾隆二十九年(1764)，沈大成(1700-1771)談到：漳蘭「最上產龍巖，葉瘦花尤妍。其次永定出，葉肥蕊亦繁。所爭在素心，純與不純間。市之以葉論，一葉值百錢。花開則計箭，一箭須千緡。」¹⁰⁰ 運至江南，價值更是不菲，故袁枚(1716-1797)〈謝望山公賜素心蘭〉詩云：建蘭「中有純白者，價值中人賦」。¹⁰¹ 實際上，收藏建蘭之風不僅在江南，江北的揚州也趨之若鶩，據《水窗春曉》記載，乾隆末年至嘉慶年間，揚州河廳以奢侈著稱，據說張松庵所買建蘭與牡丹就有上千盆。¹⁰² 《水窗春曉》又云：

建蘭之素心者，以龍巖州為第一。其花皆高出葉上，葉皆寬至六七分，離披茂密，每一大盆價百金，香氣甚烈。余所見張松庵觀察、羅子揚太守家，皆以百盆計，洵為大觀。¹⁰³

⁹⁸ 劉雅農，《上海閒話》（臺北：世界書局，1961），〈瑣談·王者之香〉，頁89。

⁹⁹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頁396-397, 402-403。

¹⁰⁰ 清·沈大成，《學福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二三，〈幽蘭吟為陳翁笠山作〉，頁366。

¹⁰¹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詩集，卷一七，〈謝望山公賜素心蘭〉，頁411。

¹⁰²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著，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河廳奢侈〉，頁41。

¹⁰³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曉》卷下，〈品蘭〉，頁67。

張松庵本名不明，為浙江紹興人，曾任官道員；羅子揚即羅鏞（江蘇宿遷人，仕至寧波知府），兩人家中素心建蘭均以百盆計，其投入之資金至少在銀萬兩以上。揚州官員與商人喜愛建蘭長期不變，咸豐六年（1856）十一月，捻匪攻佔揚州城，十二月退去後，有人見鹽院桃花泉後擺了建蘭四、五百盆。¹⁰⁴ 同治十年（1871），何紹基（1799-1873）在揚州亦有〈素心蘭〉詩：「此邦素心珍建產，論價未嫌捐壁尺」。¹⁰⁵ 而在這一股收養建蘭的熱潮背後，有一個跨省際的市場供銷體系在運作支撐。¹⁰⁶

至於江浙本地的蘭花，康熙末年，高士奇（1645-1704）曾說：蘭花「莖淡白、花淡綠、心純素者，為玉根蘭，又名素蘭，價格最高，青與紫皆不及」。¹⁰⁷ 康熙年間，嘉定士人趙俞（1636-1692）曾花費千錢購得夏蘭一缸。¹⁰⁸ 但在十八世紀以前，極少資料談及蘭花的交易價格，故收藏者投入的資金亦無從考察。乾隆初年，江南滸關沈氏培養出名種蕙花關項，花品絕世頂級，初出時每一部葉，要價制錢一百二十千，即銀百兩上下。¹⁰⁹ 以上這些零星記載，雖無法看出整體面貌，但有一個事實是可以確定的，即乾隆以後蘭花炒作開始升溫。

江浙蘭蕙之花瓣，有荷、梅、仙、超四者之稱，而以素心為最上；顏色或綠或白，或黃或紫，以金色為最貴。¹¹⁰ 乾隆年間，鮑倚雲（1709-1778）《藝蘭雜記》對此有所分析：「春蘭之幹多紫色，惟素心則綠，間亦有紫者。若花瓣短而頭圓者為梅瓣，略尖者為水仙，略長而頭闊者為荷瓣，上下皆闊者為超瓣，此俱上品。倘又為素心，則為超品矣。春蘭祇素心、紫心之分，蕙者花純綠者為綠頭，背有赤紋者為紫頭，舌淨而無赤點者為素心。」¹¹¹

由於清代社會以素心蘭為貴，養蘭者試圖在花開之前即辨識出是否為素心，吳縣汪縉（1725-1792）〈藝蘭說〉就述及此事。記事一開頭提到有位養蘭的朋友請吃飯，這位友人種了上百盆蘭花，願意送他幾盆。在座有一好品蘭者告訴養蘭

¹⁰⁴ 清·佚名，《廣陵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二，頁15。

¹⁰⁵ 清·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〇，〈素心蘭〉，頁118。

¹⁰⁶ 邱仲麟，〈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頁415-419。

¹⁰⁷ 清·高士奇，《北墅抱瓮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蘭〉，頁331。

¹⁰⁸ 清·趙俞，《紺寒亭詩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八，〈用千錢購得夏蘭一缸〉，頁620。

¹⁰⁹ 清·方時軒，《樹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蕙緣〉，頁458。

¹¹⁰ 楊鹿鳴，《蘭言四種·詠蘭瑣言》，頁20b。

¹¹¹ 楊鹿鳴，《蘭言四種·藝蘭瑣言》，頁13a。

者：「贈汪生蘭，必以素。」養蘭者回道：「芽方茁，素不素未可知也。」兩人於是談起鑑定蘭花之術。養蘭者說：「吾嘗試之，無一驗者。」品蘭者則說：「擇其佳者，取其心視之，素不素可知也。」養蘭者又說：「吾嘗取而視之矣。視之素，及華放，不素。」品蘭者再說：「取其心，浮之以定水，宿而視之，素不素可知也。」養蘭者曰：「吾試之，亦無驗。」品蘭者說：「君之拙於品蘭也，以吾術為君擇蘭數種，素必可得也。」於是選了幾盆送給汪縉，等到花開，花心如丹砂。後來，汪縉至虎邱遊玩，當時蘭花已多半凋萎，行至韓公祠前，忽見盆蘭一枝，欲開未開，其花幽綠可愛，他徘徊良許，驚歎為國香。賣蘭者說：「佳不佳，未可知也。」汪縉說：「華將放，尚無動者機，其德至靜，此而不佳，何者為佳？」賣蘭者說：

蘭之德，難言哉！有華未開時，靜若可保，華乍開，已失其靜者。有華乍開時，靜若可保，華既開，漸失其靜者。有華既開時，靜若可保，華久開，終失其靜者。有今歲華開時，靜若可保，來歲華開，忽失其靜者。故曰難言也，佳不佳未可知也。

汪縉問道：「儻有術以知之乎？」賣蘭者說：「吾老於種蘭矣，誠無術以知之也。」汪縉聞而歎道：「品蘭者挾術以知蘭，不知蘭者也。藝蘭者術窮於知蘭，其知蘭之淺者與？業蘭者無術以知蘭，其知蘭之深者與？」既而他在外授徒，主人喜愛蘭花，汪縉說蘭花極難預料。主人說：「蘭德之靜，難知也。其素，易知也。取其心，映日以視之，其心瑩然明且徹，點滓潔盡，華必素；點滓未盡，不素。」汪縉高興地拍手叫好，說終於找到方法了。¹¹² 但汪縉後來是否能辨識出素心蘭，則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隆末年起，富人與商人開始炒作江浙本地蕙花，而此與上一節提到的藝蘭專著「在地化」若合符節。關於這一風氣，據《水窗春嘯》記載：乾隆末年至嘉慶年間，蕙花有梅瓣、荷花片、水仙片諸名色，甚至有一花價值千兩者，「此惟吳越富家重之，官場無嗜之者」。¹¹³ 這些富豪或暴發戶，捨棄官場縉紳以建蘭為貴的鑑賞品味，改而炒作江浙當地的蘭蕙，或許是為了創造自我的文化價值，或許純粹是為了與士紳互別苗頭，甚至以豪奢讓人在「價格」上

¹¹² 清·汪縉，《汪子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藝蘭說〉，頁 207-208。

¹¹³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嘯》卷下，〈品蘭〉，頁 67。

刮目相看。其中，餘姚的蘭花日益受到重視，事據餘姚某氏所撰《蘭蕙說》〈原敘〉指出：

我餘姚素尚建蘭，種以焦土，沃以豆汁，壅以蠶沙，養於庭中避風日，置之水盆絕蚓螻，愛花如金枝，惜草如玉葉，而於本鄉蘭蕙，惘然莫辨。自嘉慶年間，有張應位、朱炯之二公者，各得蘭蕙一種，張公得蘭之水仙，遂曰應位，或曰張水仙；朱公得蕙之梅瓣，遂曰炯之，一名朱梅，俱純正可觀，足可傳世。我餘姚蘭蕙優劣之分，實始於此。¹¹⁴

另外，嘉慶初年，嘉善胡少梅從富陽山蘭簞中得一蕙花，參加蘇州蘭花會，富商周怡亭出價三千兩，不賣。次年，還是賣給了周氏。¹¹⁵ 道光初年，方時軒《樹蕙編》也說：近數十年來，講究浙北之蕙花，愛之者大過於甌蘭、建蘭，「其佳者一莖以葉論，值竟至數十千或數百千」。¹¹⁶

宜興所出的蘭花，也是大家爭相購取的對象，如嘉慶二年（1797）修纂的《宜興縣志》記載：春曰蘭，夏曰蕙。蘭一莖一花，或兩枝、三枝，稱為並頭、品字。蕙一莖十餘花。有秋天開花者，稱為秋蘭，亦一莖一花，但產量不多。蘭蕙以素心者為上，「士大夫家爭蓄之，有一花價數十金者」。¹¹⁷ 昭文士人孫原湘（1760-1829）即曾記載：「有貴介子，以十萬錢購得素心蘭一本」。¹¹⁸ 嘉慶年間，張光照《興蘭譜略》談花品云：

色綠為上，白次之，紅為下。白貴嫩，綠貴勻，紅貴鮮。至于佳種，名類不一。大約初出時，以所自得之人號之，既而兼金百鎰、縉錢數千貫，各私其寶，遂貫以郡邑，又或象形侔色，錫以嘉名，非兔園冊所能盡矣。¹¹⁹

這段內容，除述及花蕊顏色之高下之外，還談到命名原則及其價格，甚至賣銀子百錠、銅錢數千貫。這還算是平常的，張光照《興蘭譜略》記載名品，就提到名

¹¹⁴ 楊鹿鳴，《蘭言四種·評蘭瑣言》，頁 12b-13a。

¹¹⁵ 清·許羹梅著，楊滌清、莫磊詮釋，《蘭蕙同心錄詮釋》（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蘭蕙圖譜，〈蕙花·大一品〉，頁 135。

¹¹⁶ 清·方時軒，《樹蕙編》，〈識語〉，頁 449。

¹¹⁷ 清·阮升基、甯楷等修纂，嘉慶《宜興縣志》（臺北：宜興同鄉會，1965），卷一，〈土產〉，頁 52。

¹¹⁸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一，〈二蘭篇〉，頁 2。

¹¹⁹ 清·張光照，《興蘭譜略》，〈三之品〉，頁 13b。

蕙「翠蟬」，價至銀千兩，「種自吾家出」。¹²⁰ 嘉慶年間，有江姓幕客從江南攜來一江荷水仙素，住在嘉興新塍之間松坊。有乍浦木商看上此花，出價二千兩銀子，江某未賣。¹²¹

道光年間，各處富豪收藏蘭花者甚多，所費亦不貲，山陰周怡亭計三千兩，寓居上海之餘姚人魏筠谷計萬兩，嘉興高嘉盛則二萬兩，楓涇陳九畦也有萬兩，上海孫侍洲則二千兩，蘇州愛蘭者至多不過千兩，滸關則不過數百兩；至於「餘姚各種戶，其值雖鉅，皆藉此為生財，故不足載也」。¹²² 魏筠谷在上海經商時，曾花了洋銀八百圓購得品種綠水仙的蕙蘭一本。¹²³ 又，道光二年（1822）三月，嘉興有蕙花綠頭大鷄嘴一枝，葉只一部，方時軒出價二百千而不可得。¹²⁴ 《樹蕙編》則提到：蘇州周氏培養出品種「一品荷花」，每葉一部，要價制錢一百六十千。另外，僧人翠峰以每部葉一百廿千購得翠禪梅。至於上面言及的關項，價格漸落，三十千、二十千亦可得一部葉。道光八年三月，城隍廟西房道士買得關頂一盆，兩顆葉，價才廿洋；又淡綠舌一盆，兩顆葉，價十洋。¹²⁵

咸豐初年，太倉木商陳秋濤培出一株秋字蘭，為綠蕙梅之最佳者，咸豐七年（1857）春攜花至嘉興，與駱心閣換一品蘭，做價「佛頭千圓」，即洋銀千元。¹²⁶ 又，上海有江姓兄弟數人，自同治八年（1869）以降，每年派專人至餘姚購買名種老花，約花費二千兩，再買新花及盆器、泥土，並僱一餘姚人為其養蘭，又花了二千多兩。同治十年冬，將餘姚人辭退，僱一門外漢栽植，後來全數枯萎，共計小葉一百九十盆。¹²⁷ 可見蘭蕙不是人人皆能栽培。

江南人士熱愛蘭蕙的另一值得注意的表現，乃是清中葉蘭蕙圖譜的出現。這種蘭蕙圖譜有別於一般畫家所繪的蘭花，多半僅勾勒花蕊、花萼和花梗部位，以便對照實體的花朵。如吳縣書畫家費英所繪的《費夢僊蘭蕙譜》，計有二十四幅，包括一品、大水仙、大雪、小素、小梅、王明陽、石氏小梅、朱梅、炯字、

¹²⁰ 清·張光照，《興蘭譜略》，〈三之品〉，頁15b。

¹²¹ 清·許羹梅，《蘭蕙同心錄詮釋·蘭蕙圖譜》，〈名蕙失傳十種小像·江荷水仙素〉，頁165。

¹²²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67-68。

¹²³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60。

¹²⁴ 清·方時軒，《樹蕙編》，〈蕙緣〉，頁459。

¹²⁵ 清·方時軒，《樹蕙編》，〈蕙緣〉，頁458, 459-460。

¹²⁶ 清·許羹梅，《蘭蕙同心錄詮釋·蘭蕙圖譜》，〈名蕙失傳十種小像·秋字〉，頁167。

¹²⁷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69。

紅梅、紅棊、席白、徐梅、常熟綠梅、陳金、萬和、董字、碧玉、福字、翠蟬、劉棊、蓮素、談圓、韓公祠。¹²⁸（參見圖四、五）費英之生卒年不詳，吳翌鳳（1742-1819）《印須集》載其有《抱香閣吟稿》，¹²⁹ 應係乾嘉年間之人。

又，前面《樹蕙編》提到的蘇州周氏，即木瀆鎮周氏，係乾嘉年間著名的蘭花收藏家，據嚴元照（1773-1817）〈題《香國同心冊》并引〉說：「木瀆周氏塔影軒，藝蘭蕙多佳種，擇尤佳者各十六品，命工續其狀，繕成巨表，夢隱道人題其端曰《香國同心》。」其中，蘭有潘氏水仙、常熟葉氏大雪、社壇徐氏綠梅、常熟紅梅、曹氏白花、綠梅、趙氏梅瓣、洞庭席氏白花、韓公祠種、石氏小梅、談圓、朱氏小梅、程氏梅瓣、董氏水仙、梅瓣水仙、二梅。蕙有龔氏水仙、王名揚素、常熟葉氏荷花水仙、汪家白、荷花水仙、大水仙、常熟葉氏紅梅、處州梅瓣水仙、常熟葉氏荷花、宜興閔氏水仙、湖北陳氏白花、翠蟾、萬氏梅瓣水仙、秦梅、顧氏大水仙、曹蓮。¹³⁰ 咸豐年間，陳且陶則曾在上海蘭花會上按花繪圖，彙集成蘭譜，王慶勳（1814-1867）題其畫冊為《幽香留影圖》。在這一蘭花圖譜中，以「翠蟾」為第一品。¹³¹ 同治年間，許鼎鈇撰《蘭蕙同心錄》，亦附有《蘭蕙圖譜》。（參見圖六）

在清代後期，這種蘭蕙圖譜類似高級商品的鑑賞圖錄（illustrated catalogue），許多蘭花的愛好者多半以此做為評選的標竿。咸豐末年，錢塘章廷彥在餘姚任儒學訓導時，就與當地生員「按譜辨種，評花選蕊，晚春早夏，瓷盆檀几，羅列齋室，歲有雅會」。¹³² 光緒九年四月初一日，《申報》報導上海蕙蘭會也指出：「所列佳卉，不下百餘種，高下排列，各按蘭譜名目，懸牌開列，朗若列星，其種類不可枚舉」。¹³³ 可見蘭蕙圖譜成為蘭花會評價高下的重要參考指南。

喜愛蘭花與投資炒作，是清中葉以後並存的孿生現象。市場上多元分工，將諸多環節聯繫起來，使名花從山家或山貨行手中，逐步流入收藏家的懷抱。而在

¹²⁸ 清·費英，《費夢儂蘭蕙譜》，「上海蘭花網·古譜集珍」，<http://www.shorchid.com/showarticle.asp?id=1612-1614>（瀏覽 2009.10.10）。

¹²⁹ 清·李銘皖、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三六，〈藝文一〉，頁 3237。

¹³⁰ 清·嚴元照，《柯家山館遺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四，〈題《香國同心冊》并引〉，頁 533。

¹³¹ 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五，〈疏影〉、〈虞美人〉，頁 669。

¹³² 徐珂，《清稗類鈔》第 12 冊，〈植物類·章子辛嗜蘭成癖〉，頁 5799。

¹³³ 《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初一日，〈蘭花勝會〉，頁 3。

這個炒作蘭花的過程，花傭往往趁機從中取利。《第一香筆記》就記載：

近日吳門風氣，花市傭賣之徒，于行家買原簍，零星拆賣。一遇稍可把玩之花，即視為奇貨，如有出色者，妄立名目，索價甚昂，或有數筒至數十筒。價之豐嗇，全視子葉之多寡，若有一定焉。¹³⁴

《第一香筆記》又云：「新花時，得出色者，有等好事之人，即於客處種花家關說，名曰『花螞蟻』。」¹³⁵ 這種「花螞蟻」利用出色的新花，在蘭花收藏家之間走動，釣取願意出高價者上鉤，從而獲取仲介的利益。而這種蘭花捐客之出現，也顯示蘭花市場與花卉投資之高度發展。道光、咸豐年間，專門從事蘭花買賣的張聖林，其實就有點類似這種中間商。同治年間，許肅齋《蘭蕙同心錄》記載，張聖林曾接受嘉興方蘭陔委託，向富陽山的山家購得名種赤蕙。¹³⁶ 而張聖林也常委託山家代尋佳種，《蘭蕙同心錄》記載名種蕙花「聖林素梅」就述及此事：此花產於富陽山，張聖林問老樵夫是否見過，願出重價購買，老樵夫反覆遍尋，不可得。次年穀雨時，張聖林又囑咐老叟尋訪，歷經五日，於山隈松下尋得，花開八萼。張聖林相當高興，僱舟攜花至許肅齋家，寄其代養。許氏出二百兩購下，不令人知，種植三年，已長葉子至七筒，惜遭太平天國之亂毀去。¹³⁷ 除了聖林素梅，許肅齋還從張聖林處，獲得紹興名種的大綠梅。¹³⁸

江浙人士對於蘭花的狂熱，與市場的供貨體系緊緊相連。當時，蘇州有許多「山貨行」，專事收購外來的蘭花。據方時軒《樹蕙編》記載：「吳中山貨行所售原簍，有時頗得佳瓣，是係寧、紹、台一路所產，地近閩，故多異種與？」¹³⁹ 另外，皖南也是一大供應地。嘉慶《寧國府志》即記載：「寧國縣山谷間，蘭蕙甚多，其素心白瓣者，土人見之以為不祥，必拔其根，或摘其莖，擲于道旁而去。蘇人善鬻花者，能辨其種類，每年冬間，赴寧國山看覓，倩土人裝簍，每簍不過

¹³⁴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三，〈雜說〉，頁 73。標點有所改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無此內容。

¹³⁵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三，〈雜說〉，頁 73。標點有所改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無此內容。

¹³⁶ 清·許夔梅，《蘭蕙同心錄詮釋·蘭蕙圖譜》，〈名蕙失傳十種小像·赤蕙蓋名〉，頁 169。

¹³⁷ 清·許夔梅，《蘭蕙同心錄詮釋·蘭蕙圖譜》，〈名蕙失傳十種小像·聖林素梅〉，頁 169。

¹³⁸ 清·許夔梅，《蘭蕙同心錄詮釋·蘭蕙圖譜》，〈名蕙失傳十種小像·大綠梅〉，頁 175。

¹³⁹ 清·方時軒，《樹蕙編》，〈雜誌〉，頁 457。

數十文償其運腳而已。至蘇開簞，選有名種，可獲厚貲」。¹⁴⁰ 大致上，每當花季時節，採蘭人紛赴山上採掘，客商（中間可能有山貨行）亦蜂擁而至。嘉慶元年（1796），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嘗言：

蘭為王者香，香之祖也；蕙如君子，謂有德惠者也，故士大夫多好之。至於市井之徒，每遇春花、夏花出山，藉以取利，村南巷北，累百盈千，窮谷深山，販傭麋集，頓使幽芳奕奕，翻成逐臭之場，可為眾花發一浩歎也。然使爬羅抉剔不有若輩，又烏從而至於士大夫之前哉？¹⁴¹

袁世俊《蘭言述略》自序亦感慨蘭花成為市儈牟利之物：「每屆春初，販傭蟻集，藉以謀生，而絕壑深林，掇取殆盡，街南巷北，累百盈千，風雅之途，竟成逐利之藪，殊可歎也。」¹⁴² 從這兩段文字，大約可以想像在花季之時，蘭商至山下搶買的情況。

實際上，清中葉以後，社會上充斥著投機客，因此無不試圖尋得佳花。方時軒在《樹蕙編》就說：「年年花友買得蕙花兩、三簞，沾手塗足，腰腳俱折。偶得一、二可觀之萼，既各自誇，又復相羨。頗似未放榜之舉子，人人有望，及至開時，一無可取，喪氣而已。」¹⁴³ 其幸運的例子，如道咸年間，震澤人王源通與翁、陳兩位友人，同買蘭花一大簞，打開後發現其中有佳品，價值銀子數十兩。¹⁴⁴ 而朱積山在上海，自同治初年起開始養蘭蕙，每年春間必購新蕙四、五百簞而擇取其細種，雖偶有一、二種，終究難以獲得佳品，真是可遇而不可求。¹⁴⁵

有些收藏者往往先居奇，稍後再高價售出，純粹是為了牟利。對於摯愛蘭花者而言，這種行為並非蘭花的真正知己。嘉定書畫家程庭鷺（1798-1859）在〈藝蘭說〉即指出：蘭生於深山窮谷，與眾草為伍，不求自異而香氣清遠，「有獨潔之操」。春天時，山中樵夫捆載入市，「嗜蘭者得佳種則秘焉，或資以獲利」。

¹⁴⁰ 清·魯銓、洪亮吉等修纂，嘉慶《寧國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八，〈食貨志·物產〉，頁586。

¹⁴¹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一，〈本性〉，頁23-24。「麋集」原作「腐集」，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改正。又，標點有所改動。

¹⁴²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自序〉，頁3。

¹⁴³ 清·方時軒，《樹蕙編》，〈雜誌〉，頁456。

¹⁴⁴ 清·俞樾，《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四編，卷二，〈王蟾生傳〉，頁913。

¹⁴⁵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64。

好事者又設蘭花會，「相與誇鬥其所有，蓋爭奇於花之形似耳。大抵以瓣之似梅、似荷、似水仙者為上，素心已次之，四者之外，概置勿論」。他本人對於「世俗所品第者，懵不能辨」，惟求領會蘭花的馨逸之姿，有如於空山岑寂之處，忽然遭逢幽隱之人，「相契無言，兩忘形迹」。某人曾造訪他家，驚訝地指著一株蘭花說：「綠瓣白而瓣悉抱心，此異種也，直若干金。明年復發，直更數倍。」接著，感嘆道：「僕之癖此深矣，購求佳種，久無所得。乃子無意遇之，而不知貴，負蘭實甚矣。」程庭鷺回應道：

天下之相需迫而遇愈疏者，豈第蘭哉？……子之品第夫蘭者，取其貌而遺其神，論其似而失其真，但形跡之求肖，幾馨逸之不聞。余誠負蘭，而子以世俗之所貴貴之，果蘭之知己乎？否乎？夫以直之輕重，定品之高下，猶懸千金以市駿，好名者趨之，狷潔自愛者聞而遠引也。子其何解於是蘭耶？

這位仁兄聽了之後，噤嘿而去。¹⁴⁶ 而在當時，心態類似某人者可能不少。前面談到的王源通、朱積山等人，或許僅是蘭癡而非炒作客，但這中間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若養得佳蘭異蕙，有人出千兩的高價，花主或許還是會動心，於是心愛的蘭花便成銅臭物的工具。

清代後期流風競以花蕊為貴，不重花之香氣，故道光十五年（1835），餘姚士人朱文治（1760-1845）有詩云：「近日藝蘭喜看頭，為尋梅瓣尚時流。老夫萬事皆知足，但願春風香滿樓。」¹⁴⁷ 而江南名醫盛大士（1771-1836）之子盛徵祺亦有「藝蘭必擇花頭」之言，說者謂其未免俗氣。¹⁴⁸ 清朝末年，江寧鄭寶慈旅居浙江，喜歡養種蘭花，後來與同鄉楊鹿鳴說：「浙蘭最難養，雖建蘭無其美，亦無其嬌也」。剛種時葉子甚寬，「逐年漸細，寬有細如韭菜者」；還未開花時，「每新草一筒，識者以重價爭購焉，駿骨蘭胎，市以千金，有相賞於風塵之外者矣」。¹⁴⁹ 「雖建蘭無其美，亦無其嬌」這一段話，道出浙蘭嬌麗的特點，或許乾隆末年以降的豪富者就是看上這一點，從而可見其品賞蘭花的審美觀，與士大夫喜歡建蘭之清香大異其趣，雅俗自是有別。

¹⁴⁶ 清·程庭鷺，《小松園閣雜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卷中，〈藝蘭說〉，頁23-24。

¹⁴⁷ 清·朱文治，《繞竹山房續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一二，〈采蘭詞〉，頁208。

¹⁴⁸ 楊鹿鳴，《蘭言四種·詠蘭瑣言》，頁20b。

¹⁴⁹ 楊鹿鳴，《蘭言四種·評蘭瑣言》，頁12a。

四·競賽蘭花會

清代江南各地的種花業者，常在花朝日（相傳為百花生日，日期因地而異，在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時舉行花卉展覽，如乾隆末年，尤維熊（1762-1809）〈虎邱新竹枝詞八首〉之一說道：「花神廟裏賽花神，未到花時花事新。不是此中偏放早，布金地煖易為春。」¹⁵⁰ 這種賽會的用意純為酬神，養花人各以所種的佳花異卉上供，或許並非為了炒作。乾隆末年，揚州新城牌樓口天福居有花市，每年花朝日，「於對門張秀才家，作百花會，四鄉名花集焉」。¹⁵¹ 道光年間，甘熙（1797-1857）記載金陵有花神廟，每歲花朝，賣花之家，各以花供獻，凡牡丹、芍藥、海棠、碧桃之屬，競秀爭妍，備極其勝，謂之花神會。¹⁵²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出現賽花會。清代江南的賽花會，分為插花與盆花兩類，但插花賽會較少，就筆者所見，僅只蘇州一處。如乾隆年間，每年九月洞庭神君生日，蘇州城內醋庫巷的水仙廟必有插花賽會。據沈復記載：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稱為水仙廟，其中迴廊曲折，小有園閣亭臺。每逢神明誕辰時，眾姓各認一院落，「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由於沈復嫻習藝花之術，在與芸娘結婚的這一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曾被友人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

至於江南盆花之賽會，以蘭花會與菊花會最為有名。¹⁵³ 關於清代江南的蘭花會（orchid show），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¹⁵⁴ 但篇幅與內容較為簡短，還可以繼續深入考察。乾隆年間，吳騫（1733-1813）在《桃溪客語》記載：宜興桃溪的蘭花，遠近諸多山谷皆有生長，而以素心而荷花瓣者為上品，「好事家每遇花時，則設讌會以第其高下」。¹⁵⁵ 這似乎已經帶有蘭花會的性質。嘉慶元年，蘇州朱克柔在《第一香筆記》曾言：「古人于蘭蕙，不過形於篇詠間，有好者藉以娛目悅心，適一時之性而已。今則合志同方，甚而互相標榜，每年春二、三月間為花之

¹⁵⁰ 清·尤維熊，〈虎邱新竹枝詞八首〉，王利器等編，《歷代竹枝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2冊，丙編，頁1491。

¹⁵¹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校點，《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四，〈新城北錄中〉，頁80。

¹⁵²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二，頁6087。

¹⁵³ 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頁90-92。

¹⁵⁴ 舒迎瀾，《古代花卉》，頁260；〈清代江浙滬之蘭蕙花市與花會〉，頁38-39。

¹⁵⁵ 清·吳騫，《桃溪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頁525。

會，賢愚競逐，雅俗共賞。」¹⁵⁶ 由此看來，蘇州較為正式的蘭花會，應在乾隆年間已經存在。從某角度來說，蘭花會的出現，提供了蘭花炒作的空間場域。嘉慶年間，嘉善士人黃凱均就提及此事：

蕙蘭有梅瓣、水僊瓣、荷花瓣數種，素心蘭非所重也。每有人以百、數十錢，得之於未排鈴之前，至放花時，他州外郡聞其名，不遠數百里而就觀。有好事者洩其花主，素所相好之人並出重價謀得之，至有千金或數百金不等，其人尚未肯輕售。遇善培植之人，遲一、二年發葉可分始售，二、三年分而再售，緣此可以起家。所以販花者，當初春時充肆羅列，買之人亦遍栽庭砌，然而千百中偶一得之，如獲重寶焉。大約近時通都大邑多作花會，未能誇勝，故不惜重資，必得異品，以居首座凡花會，不論少長，以花品序位。陸放翁自稱海棠顛，斯可謂蕙癡。¹⁵⁷

由此看來，當時已經出現專門仲介奇品蘭花交易的「好事者」，而黃凱均認為社會上對蕙蘭趨之若鶩，不惜高價購買，與許多城市舉辦蘭花會有直接關連。另據朱錫綬 (1819-1869)《沮江隨筆》記載：

吳俗喜蓄蘭，花時競賞，裙屐如雲。幼見有榜園扉者曰某日蘭花會；至日，數百里內異卉畢來，主人評高下而次第之。最上者，秘置密室，籠素紗，引井華水徐沃之，非風雅士不肯輒納；次者，分列亭軒；又次者，排列廠院。……大率色以白為上，心以素為上，瓣以圓為上，香以淨為上，莖以亭亭玉立為上，朶以疏落掩映為上，兼全者千不獲一。其名有梅瓣、水仙、荷花之類，類取形似。花之佳者，多生貧家，初苞即遠近爭傳，三數日間，縉紳之嗜花者踵至，遂有議價者，奇花一朶，索價或至數萬錢。¹⁵⁸

¹⁵⁶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三，〈雜說〉，頁 73。標點有所改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無此內容。

¹⁵⁷ 清·黃凱均，《遣睡雜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六，〈千金買蕙〉，頁 645。

¹⁵⁸ 清·朱錫綬，《沮江隨筆》（清光緒十六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下，〈蘭蕙〉，頁 11a-b。並見楊鹿鳴，《蘭言四種·蕪蘭瑣言》引朱錫綬《疏蘭仙館筆記》，頁 19b。後者內容小異：「吳俗喜蓄蘭，花時競賞，裙屐如雲。每屆蘭花會，異卉畢集，司花者評高下而次第之。最上者，秘置密室，籠素紗，引天水徐沃之；次者，分列亭軒；又次者，排列廠院。……大率色以白為上，心以素為上，瓣以圓為上，香以淨為上，莖以亭亭玉立為上，朶以疏落掩映為上，兼全者千不獲一。其名有梅瓣、水仙、荷瓣之類，類取形似。花之佳者，多生貧家，初苞即遠近爭傳，三數日間，縉紳之嗜花者踵至，遂有議價者，奇花一朶，索價或至數萬錢。」

這段記載點出蘇州蘭花會的品評標準，與擺列的空間高下，最重要的是一旦會前有奇花的訊息傳出，便有愛蘭者競來議價。由此可以證明，蘭花會的展覽對於蘭花價格的炒作有正面的作用。而在咸豐十年（1860）以前，江南諸多城鎮之蘭花會頗盛，「蘇郡不時舉會，無一定之期，滸關亦每年必聚。嘉興、楓涇等處，名花比會，誠大觀也。」¹⁵⁹ 太平天國之亂對江南各地的蘭花會造成不小的影響，除上海持續不斷外，大部份在亂後不再舉行，故許瑤光（1817-1881）有詩提到：「金閶舊有蘭花會，滸墅關前暄暮春。兵後豪家半蕭索，斯會移至黃浦濱。」¹⁶⁰ 光緒初年，袁世俊亦言：咸豐十年以後，江南之蘭花會，「雲散風流，難尋陳迹矣」。¹⁶¹

據記載，上海蘭花會起於乾隆年間，每年一次，於城隍廟內舉行。¹⁶² 實際上，上海不僅只有蘭花會。道光六年（1826），謝元淮（1784-?）記載：「上海城隍廟園庭甲於江左，每當花時，各出異品供神，盛陳燈綵，縱人遊觀，如水仙、梅花、牡丹、芍藥、蘭花、杜鵑、菊花，各以時獻。」¹⁶³ 可見上海城隍廟的花會，隨季節不同而展出的花卉亦有異。而由於江南士人深愛蘭花，故蘭花會最受重視。咸豐三年（1853），王韜（1828-1897）說：每年四月下旬，上海西園有蘭花會，「萃閩產之佳者數百本，羅列案頭，鬪奇爭勝」。¹⁶⁴ 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參展的蘭花主要是福蘭，與其他記載不同。

太平天國之亂後，上海的蘭花會雖未中斷，但參與者也有所減少。在咸豐十年以前，上海蘭花會與會者約三十餘人，每人各出洋銀一圓以作公分，若遇經費不足，則舉與會者四人公貼，稱為「當大會」。咸豐以後，赴會者僅十人而已，「或送香燭，所費缺乏，則倡首者竭力當之」。¹⁶⁵ 但至同治年間，情況似有所好轉，故蔣敦復（1808-1867）說：「滬城每歲三月，於豫園中作蘭花會，名種畢至，貴者價過百金」。¹⁶⁶ 毛祥麟也說：

¹⁵⁹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 65。

¹⁶⁰ 清·許瑤光，《雪門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三上，〈禾人品菊索詩〉，頁 245。

¹⁶¹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 65。

¹⁶²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 65。

¹⁶³ 清·謝元淮，《養默山房詩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七，〈上海邑廟看杜鵑花〉，頁 56。

¹⁶⁴ 清·王韜，《瀛壖雜誌》（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一，頁 44。

¹⁶⁵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 65-66。

¹⁶⁶ 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集》卷五，〈疏影〉，頁 669。

滬城花會，莫盛於蘭。以藝蘭家不惜多金，購求名種，四方花客，捆載以
來，故得獨富。春時花發，爭奇鬥勝，咸集豫園。貴重如一品、五兜、翠
蟾、玉蝶者，皆水仙、梅瓣中異品。更有金雪、硃墨之奇，巧蝶、蟲蘭之
異。名花百種，一室爭妍，洵為韻事。¹⁶⁷

這段話一開頭也指出參展者不惜代價購買名花，希望在蘭花會上能一鳴驚人。
同治七年（1868），《教會新報》報導該年蘭花會以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四月
初一日為會期，地點在豫園之內園，上海城內珍愛蘭花者皆來參展。其中，
「有一法家為品選，以第一為列居中」。然而，奇香妙品，「任由某法家主
之」，但難免有好勝者請託等事，「縱得第一，有何趣味」？加上三日之中，
人多擁擠，「鄉婦村嫗，成羣結隊，尤有妓女艷粧紛紜而至，所以少年浪子借
看蘭花會為由頭，故意逗留，終難緩步徐行，所以汗流屁跡，其味不堪」。而
且，「品花者未見有真本事，是何選舉？受何職分？諸愛蘭之家，甘受伸屈，
真堪一笑。」¹⁶⁸ 可見其對蘭花會評審的公平性並不看好。實際上，在蘭花會中
炒作價格者往往是商人，故光緒二年（1876）譚宗浚（1846-1888）說：「上海
賈兒，近日喜為鬪蘭會」。¹⁶⁹

上海每年舉辦的蘭蕙花會，《申報》均有報導，如光緒元年（1875）三月廿
五日，《申報》報導：「本埠於今日起，設蘭花會於邑廟內園，共三日。凡植有
奇葩異種者，盡送入會中，俾眾觀賞，真所謂樂事逢春者也。」¹⁷⁰ 而從《申報》
的報導，可知上海蘭花會每年有兩次。光緒二年四月十五日的《申報》即指出：

滬上每年之蘭花會，春、夏兩次。然春初開者為蘭，一莖一萼，夏初開者
為蕙，一箭數花。蕙之品固不如蘭，而香亦遜焉。滬俗則重蕙輕蘭，名色
不下十餘種，筆者以一品為尊，素者以金亞居首。曩時一葦草，須洋百餘
元，今者什不值一矣。皆為浙東、西所產，如富陽、諸暨、餘姚、奉化諸
山，在在有之，佳品則餘姚最多。顧同一葉也，同一花也，尚須辨其色之

¹⁶⁷ 清·毛祥麟著，畢萬忱點校，《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四，〈花會〉，頁55-56。

¹⁶⁸（美）林樂知主編，《教會新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第1卷，〈品蘭會〉，頁352。

¹⁶⁹ 清·譚宗浚，《荔村草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七，〈使蜀集上·詠園中草木〉，頁238。

¹⁷⁰《申報》光緒乙亥三月廿五日，〈邑廟蘭花會〉，頁3。後續報導，見光緒乙亥三月廿六日，〈紀邑廟蘭花會之勝〉，頁2。

枯潤、朵之肥弱。先春而種，按譜以求，較諸評量環肥燕瘦，尤覺煞費工夫。¹⁷¹

關於花會的情況，長期擔任《申報》主筆的葛元煦，在《滬遊雜記》記載：

滬俗尚蘭蕙，有梅瓣、水仙瓣、荷瓣等名。愛者以重值購之，甚至一花值數十金。會設邑廟園中，二月在船舫廳者為蘭，三月在內園者為蕙。屆期，各蒔植家，以佳種入會，斐几湘簾，磁盆竹格，陳設幽雅，遊賞者甚眾。¹⁷²

光緒九年（1883）二月十九日，《申報》的報導也提到：「春末夏初，設於內園者，為蕙蘭會。而此次設於船舫廳者，乃草蘭會」。¹⁷³ 光緒十年二月末，《申報》亦云：「滬濱人士，每年在豫園中，例有蘭花會之舉，在春初者謂之『春蘭會』，在夏初者謂之『蕙蘭會』。」¹⁷⁴ 由於江南人士重視蕙蘭，因此《申報》關於蕙蘭會的報導往往較多而且詳細。另外，光緒十年四月，《點石齋畫報》也曾報導豫園的蕙蘭會：「滬城邑廟豫園之內，每年於立夏節邊設蕙蘭會三日，藉娛神而兼角勝也。」¹⁷⁵（參見圖七）

參展的蘭蕙，在花會中獲選為狀元之後，往往身價高漲。光緒三年（1877），上海的春蘭會在二月十三至十四日，移設於豫園船舫廳。至於蕙蘭會，日期為三月十八至二十日，據《申報》指出，上海養蘭最多者，城內為朱接三，城外為尹松基，而宋月峯、顧少梅所種，參展者也各有六、七盆。其中，有一盆梅瓣者被評為狀元，「即前數日滬上共傳東街彩局中葉君以八十文購得，而計值百二十金者也」。¹⁷⁶ 從報導中可見，一盆八十文的蘭花，最後交易價格是一百二十兩，前後相差一千多倍，不得不說水漲船高、利潤驚人。光緒九年，《申報》〈豫園蕙蘭雅集說〉記上海蘭蕙花會的評審方式云：

社在潘氏豫園東南別墅，俗稱內園，水木清華，擅峯巒亭榭之勝，每年春夏之交，為蕙蘭雅集，視菊梅諸社為尤盛，列几案數重而盆供之。初蒔者

¹⁷¹ 《申報》光緒丙子四月十五日，〈蘭蕙之分〉，頁2。

¹⁷²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一，〈蘭花會〉，頁65。

¹⁷³ 《申報》光緒九年二月十九日，〈品蘭續誌〉，頁3。

¹⁷⁴ 《申報》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品蘭雅集〉，頁2。

¹⁷⁵ 清·吳友如等，《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第1冊，圖10，〈雅集名蕙〉。

¹⁷⁶ 《申報》光緒丁丑二月十五日，〈本埠雜事〉，頁3；光緒丁丑三月十五日，〈蕙蘭會日期〉，頁2；光緒丁丑三月十九日，〈邑廟看花〉，頁2；光緒丁丑三月二十日，〈看花續述〉，頁2。

為新花，品雖甚高，不得居前列，猶諸草茹新進，雖負曠代異才，自命不凡如賈生，亦不得伍絳灌焉。復盆者為老花，山氣盡脫，丰神靜穆，葉柔滑如水，花鮮妍如笑，其品超逸居前列無論矣，即不甚岐嶷，而久經培植，根著於土，花孕於根，嶄然秀出，風韻自饒，亦得別置一榻香國中，位次井然，縱使竹彈果諫，不得進退而高下之。然所登蘭品，以瓣為程式，素心、梅瓣居無上品，瓣如水仙、如荷者次之，求所謂金蘭、墨蘭、赤蘭、石蘭，未之見也。¹⁷⁷

黃協塤 (1852-1925)《淞南夢影錄》也提及此事：每年二、三月，豫園有蘭花會，其中「湘江佳種，羅列滿堂」。攜蘭花參加者，由主事者「別其種類，品其高低」，其花有老幹、新幹之分，與梅瓣、荷瓣、水仙瓣之別。蘭花盆上各貼紅簽，寫蘭花主人姓名。其獲得首選者，同仁則稱為狀元。會期計三日，普通百姓皆可進入觀賞。¹⁷⁸

清末上海蘭蕙花會最值得注意者，乃是豫園、徐園兩者之間的競逐。如前所言，上海春蘭會一向在城隍廟的豫園，光緒十三年 (1887) 則改在閘北的徐園。這年三月初六日，《申報》報導：

滬上名流，夙喜藝蘭，當春日暄妍，輒就邑廟豫園為盛會，第其高下，別其等差，空山中不求聞達之儔，至此一經品題，亦居然價增十倍矣。今歲會首吳君渭聘，以豫園僻在城中，多所不便，因商之老閘北首徐園主人隸山司馬，於本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設會園中，以為雅集。¹⁷⁹

「至此一經品題，亦居然價增十倍」這兩句話，實可佐證蘭花會與蘭花炒作之間的正相關性。三月十一日，《申報》又報導，有人問徐園主人：「滬上蘭花會，向在邑廟豫園，數十年來著為成例，今獨遷移於此，其有說乎？」其回答是：「蘭為國香，其品喜潔，清標獨立，無言自芳，不特人氣蒸騰，是所深忌，即龍涎、麝腦亦迴不相投」。然而，「當其高列豫園，任人評視，屠沽俗子，負販庸夫，以及鄉媪邨姬，重儻賤隸，莫不捱肩插足，爭先往觀，甚至瘍者、癩者、盲者、跛者、算命者、賣卦者側身於稠人廣眾之中，喧嘩擠擁，問其故，曰觀蘭也。」在此情況下，名士雅流反而不願前往。所以移會至此，進園者必須納錢才得觀

¹⁷⁷ 《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十二日，〈豫園蕙蘭雅集說〉，頁1。

¹⁷⁸ 清·黃協塤，《淞南夢影錄》（臺北：新興書局，1978），卷二，頁4274。

¹⁷⁹ 《申報》光緒十三年三月初六日，〈春蘭雅集〉，頁2。

賞，則一般俗流自然望塵而不敢來。¹⁸⁰ 換言之，在豫園是雅俗共賞，而徐園則是有意區隔雅俗。這兩個園林的蘭蕙花會，在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的《申報》上均有報導，於此不加贅述。

另從《申報》的報導可以看出，蘭花會是每日重新品評一次。如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豫園蕙蘭會首日，「藝蘭者於清晨將各花舁至園中，亭午時品評甲乙」，「老花祇有二本，一為常合泰之梅瓣，一為祿慎居之金盞素心。新花共有三十餘本，幽芬冷艷，滌盡塵氛，就中以蔣姓之梅形水仙為冠」。二十一日中午，「會中人各舁名花，互評優劣」。老花共有四本，除常合泰、祿慎居之梅瓣、金盞素心二本外，尚有另外二本，一為素心，一為梅瓣，均係寧波應長順所植。新花共有六十餘本，推陳姓之梅瓣水仙為最，蔣姓之梅瓣水仙則屈居第二。¹⁸¹ 又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豫園蕙蘭會，時間為閏三月十八、十九、二十日，「凡工於藝蘭者，各携奇花異卉，齊集邑廟內園，評定甲乙，安置正廳之上，任人觀覽」。首日所供約七十餘盆，其中以「花開八瓣，形如蝴蝶者」最為珍貴。次日，「佳蕙約有百盆，內有紅瓣素心者，實為羣芳領袖云」。第三日，計共一百餘盆，其中有墨蘭一盆，「實最為珍異之品」。¹⁸²

蘭蕙會舉辦時，甚至需要兵勇到場維持秩序，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八至初十，豫園舉辦蕙蘭會。花會首日，「天公做美，紅男綠女之結隊往觀者，途為之塞」，附近巡防局派勇丁數名往來彈壓，以防滋生事端。¹⁸³

而由於蘭花會甚盛，浙江、福建的蘭花絡繹不絕而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秦榮光（1841-1904）《上海縣竹枝詞》有一詩云：「蘭裝竹簍浙閩來，價值千金一朵開。歲歲廟園花會盛，俗傳上海種珍倍。」詩註云：蘭蕙來自浙、閩，每年約有數千簍，種蘭花之家，挑取其佳品，所蓄常值銀千兩，遂相傳是上海種，名聲著於三吳之間。¹⁸⁴ 這種競相購取奇種異品，試圖在蘭花會上取勝的現象，其實類似一種花卉賭博。

¹⁸⁰ 《申報》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徐園品蘭記〉，頁1。

¹⁸¹ 《申報》光緒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九畹揚芬〉，頁3；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蘭會再誌〉，頁3。

¹⁸² 《申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九日，〈品蘭小誌〉，頁3；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日，〈品蘭再誌〉，頁3；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品蘭三誌〉，頁3。

¹⁸³ 《申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五日，〈蘭會將開〉，頁3；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九日，〈邑廟賽蘭〉，頁3。

¹⁸⁴ 清·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揚州：廣陵書社，2003），頁104。

蘇州方面，蘭花會於咸豐十年停辦後，養蘭蕙者皆為商賈，士人甚少；至同治十二年（1873）春，始有縉紳至上海購買老種名花，於四月初五日舉行花會，「士紳濟濟，觀者如堵，大為勝舉」。¹⁸⁵ 故同治《蘇州府志》（光緒八年刊刻）記載：蘇州城每逢四月，「擇日為品蘭會，數百里異種畢至，金蘭為上，素心次之，有梅瓣、荷花、水仙之目」。¹⁸⁶ 光緒八年（1882）二月，《申報》亦有報導指出：

嘉、道年間，蘇城及滸關、常州等處盛行蘭花會，巨紳大戶，各出異種，爭奇鬥艷，舉國若狂。其品以梅瓣、水仙瓣為入格，舌欲圓，肩欲平，捧心欲緊。其名有劉海舌、小蕩梅、上海梅、玉蝴蝶及金雀、銀鳳之類，不下數百種。每年得一奇品，又各自立名目，羣相慶賀，好事者置酒掛紅，傳觀贊歎，往往一花數葉，價值千金，洵昇平樂事也。兵燹後，滿目荊榛，此事遂廢。閱數年，雅人逸士，清興復發，蘇垣作會者有十餘家，雖不及從前之盛，而物希見貴，更足稱奇。本月初七、八兩日，獅子林主人邀集同人，舉此□會，於是各出名種，萃集園林。¹⁸⁷

光緒九年（1883）二月，獅子林又循舊例，於廿一、廿二、廿三日舉辦蘭花會。¹⁸⁸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申報》報導：二十七、八、九三日，「好事者就獅子林為蘭花會，黃磁綺石，座滿奇葩。」¹⁸⁹

除了獅子林，怡園也是蘭花展出的地點之一。光緒十一年（1885）四月初，《申報》報導：三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怡園主人創設蘭花會，「一時齊姜宋子、蔣妹邢姨，聯袂倚裳，趨之若市」，「而青年子弟，結隊看花，又復雲蒸霞蔚」。知府恐男女混淆，有傷風化，於是下令禁止婦女進入，次日「扇影衣香，一時絕跡」。¹⁹⁰ 稍後，《申報》記者又報導：

三吳夙稱清淑之區，生斯土者氣稟秀靈，性好遊覽，況值錢春時節，迎夏光陰，萬紫千紅，一齊怒放，園林之勝概，山水之清幽，幸而身歷其境，詎肯冥想臥遊，以畢乃事？故邇日若留園、若怡園，以及獅林、虎阜，無不筭與乘月，蘭槳劃波，士女如雲，盡情遊覽。其中，尤以留園之牡丹

¹⁸⁵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附錄〉，頁67。

¹⁸⁶ 清·李銘皖、馮桂芬等，同治《蘇州府志》卷三，〈風俗〉，頁139。

¹⁸⁷ 《申報》光緒八年二月十五日，〈品蘭雅集〉，頁2。

¹⁸⁸ 《申報》光緒九年二月廿六日，〈吳會叢談〉，頁2。

¹⁸⁹ 《申報》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一日，〈鶴市嬉春〉，頁2。

¹⁹⁰ 《申報》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吳下街談〉，頁2。

臺，怡園之蘭花會，遊人最盛，衣香鬢影，裝點林泉，宜無傷乎大雅。乃自荼蘼開到，人盡送春，官憲亦旋垂厲禁，凡城廂內外各園，不准擅放婦女入內遊行，並派差分往傳諭，各園遵照憲諭，莫不奉令維謹，標貼園門，自四月朔起，舉凡碧玉小家、紅閨弱質、秋江商婦、春夢老婆，均述明憲諭森嚴，各以閉門羹相待云。¹⁹¹

後來，留園亦有蘭花會。光緒三十三年（1907）閏二月十四日，《圖畫新聞》就報導：「本月初五、六、七等日，蘇州留園大開蘭花會。傾城士女，駕言出遊者，寶馬香車，絡繹不絕，迨至夕陽西下，始緩緩而歸。聞園中所陳蘭花，以安慶陳姓為首屈一指，本城貝姓之花亦堪伯仲」。¹⁹²（參見圖八）宣統二年（1910）四月，留園又增開夏蘭會。¹⁹³

晚清時杭州亦有蘭花賽會。據《杭俗怡情碎錦》記載：四月初八日，「雅士擺蘭花賽會，有金蘭、荷瓣、梅瓣、水仙名目，最貴素心」。¹⁹⁴又據記載，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月，杭州藝蘭家於城隍山海會寺舉辦蕙花會，杭州府桐廬縣貢生臧芾伯攜綠蕙一種前來與會，是官種水仙之絕佳者，滿盆約有二十餘筒，每筒要價二百洋元。因索價太高，乏人問津。¹⁹⁵

又，清朝末年，廣州區金策在《嶺海蘭言》嘗言：江南有賽蘭會，「舉凡頂正肩平，捧心緊抱，唇凸舌立者」，謂之上品。無論葷心、素心，以入格者為貴。每年臘月時，園匠入山採取，用竹簍裝盛，運回家中，放置於有風無日之處，灑上清水，待其冒花之後，選入格者種盆，亦有荷瓣、梅瓣諸色目。據聞每年必有一、二奇種，為向來所未見者。但至次年，往往變為下品。其不變種者，謂之「覆盆」，又謂之「入格」，江南人多用以觀察運氣。不入格者，視為下材，花開後即棄之。¹⁹⁶廣州一向未有蘭花會，區金策的記述可以代表晚清嶺南藝蘭界對江南蘭花會的認知。

¹⁹¹ 《申報》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吳遊勝筆〉，頁2。

¹⁹² 清·時事報館編，《圖畫新聞》（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上冊，頁46。

¹⁹³ 《申報》宣統二年四月初一日，第12版，〈留園蘭花堪賞〉。

¹⁹⁴ 清·佚名，《杭俗怡情碎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時序類·四月初八放生〉，頁14。

¹⁹⁵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318。

¹⁹⁶ 清·區金策著，魯子青校注翻譯，《嶺海蘭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卷下，〈細葉蘭種·占春魁〉，頁88。標點有所改動。

五·詐騙客與蘭花賊

由於蘭花價格水漲船高，市場上多有詭詐之事。晚明江南花卉交易以假為真，葉權（1522-1578）在《賢博編》早已指摘：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¹⁹⁷ 清朝初年，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則提到：「凡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烟，熏盞蓋花，則白」。¹⁹⁸ 後來，這種技術常被運用在商業詐騙上。據朱克柔《第一香筆記》記載：蘭花商將「花之肥者，用刀刮去心中之紅色，再以硫磺熏之，變作素花，次日即萎，現粉紅色，種種作偽，人心叵測」。¹⁹⁹ 他還提到其他的詐騙手法：

蕙花植盆，惟得大塊，亦須根葉好者，次年方得有花。今市中揀花、殼、根葉相似者并作大塊，甚有將斷蕊插入者。有將小塊紐作大塊，殼色不等，每提十餘箭者，名曰立花。有將小蕊箝下，視花瓣闊狹并心之與否者。不知素花可見，而瓣甚難憑。種種作偽心勞，不可不知。²⁰⁰

袁世俊《蘭言述略》亦記載：「蘭蕙中謀利者，弊亦莫測」，如以硫黃燻花舌使變為素色，再開仍是紅色；或有真花假葉者，俗稱「插吊」；或真花葉少，以別株嫁接，俗稱「駢葉」。道光年間，嘉興人高某酷愛蘭蕙，欲求十全十美之上品，富陽陸姓花匠，乃以金盞素的花，用上海梅瓣的捧心，以魚膠黏上，售價銀五百兩。高某給了銀子後發現作偽，找到陸某，一陣怒罵。陸某詭稱也有真的，但價錢必須加倍。高某愛花成癖，竟然答應。陸某又將上海梅瓣的花、金盞素的舌，用魚膠相黏，高某取花時並未看出，給一千兩後才發現是假貨。兩次被騙，頗為憤恨，而花販已逃之夭夭。²⁰¹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有揚州寓公在上海城隍廟豫園桂花廳，見到賣草蘭者所擺蘭花中有一素心者，以一百二十文買回，種入盆中，供在堂前。當天晚

¹⁹⁷ 明·葉權著，凌毅點校，《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

¹⁹⁸ 明·方以智編，《物理小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九，〈艸木類·艸木好惡〉，頁568。

¹⁹⁹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三，〈雜說〉，頁73。標點有所改動。「用刀刮去」，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作「用竹刀刮去」。

²⁰⁰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卷三，〈雜說〉，頁73。標點有所改動。此段文字，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互異者甚多，抄本作「蘭蕙植盆，雖得大塊，亦須根葉好者，次年方有復花。今市中揀殼、根、葉似者并作大塊，甚有將小塊以鐵絲穿作大提，殼色不等，每提十餘箭者，名曰立花。」北京抄本「十餘箭」作「十餘剪」，實訛。

²⁰¹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59-60。

上，放置室外，恰巧遇上下雨，第二天一看，變成赤心蘭。²⁰² 光緒中葉，蘇州顧翔霄愛蘭成癖，每當春日之時，聽見某處出現佳種，不問路之遠近，必雇舟前往觀看，且不惜重金購買。有一紹興花販，故意住於鄉下遠僻之處，將初開之大一品，罩於大竹筒中，用硫磺薰，使花變成純白，然後派人通知，顧翔霄隨即雇舟前往。紹興人故意將花藏在密簾之中奉為至寶，顧翔霄打開一看，果然是素梅，再三討價還價，以銀子一千兩購歸。次日，不但花舌轉紅，而蘭株也漸漸枯萎。前往尋覓花販，則早已不見人影。²⁰³

以下等蘭花充當上品，也是欺騙手段之一。據《蘭言述略》記載：咸豐十年(1860)以前，富陽人張升林(可能是張聖林之訛)，向餘姚蘭戶購得蘭蕙，再前往各處販賣，「或將假種賺人」，購買者不察，往往受騙。²⁰⁴ 又，前面談到浙東蘭花有「大山」、「中山」、「小山」之稱，清芬室主人在《藝蘭秘訣》也記載此事：其葉大者謂之「大山」，其葉小者謂之「中山」。葉之大小，因產地而異，如龍游、富陽等處產量不多，而所產多是上品，其葉較尋常者為大，故稱之為「大山」。所謂「大山」，並非指山之大小，而是指花的品質高，因此冠以「大」字，「所以表明其高貴也」。物以稀為貴，其花品既高，故所產不多，加上山路崎嶇，不容易登臨，前往採掘者極少。即使有一、二位，「登高崗，臨絕壁，窮搜幽谷，亦等於鳳毛麟角耳」。晚清江南人家所養的蘭花，往往購自上海者為多，而上海所謂「大山」者，「大都是市儈欺人，實皆贗本也」。²⁰⁵

清芬室主人在《藝蘭秘訣》還提到：「賣花傭作弊之手法，防不勝防」。以他所經歷者言之，約有數種。其一是「假塊頭」。買者在選購之時，無論是蘭是蕙，必要選取葉茂而根盛者，即所謂的「大塊頭」。「大塊頭」的賣價，「較普通者倍之或數倍之，視其塊之大小而定其價之低昂」。而花商作偽之法，「或用棕絲紮縛，或用竹絲拼合，驟視之，固若天然大塊也，細視之，其紮縛拼合之處，顯然呈露矣」。其二為「假裝箭頭」。凡選購蘭蕙，必先看根葉，然後看花箭。養花人看春蘭法有云：「凡箭頭具異形，而於尋常之品不同者，必為異種。」花販自然也深知這種道理，於是假造以騙人。其方法是在「其他植物中，

²⁰² 清·廣陵補勤子，〈假素蕊蘭〉，《申報》同治癸酉二月廿七日，頁2。

²⁰³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318。

²⁰⁴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61-62。

²⁰⁵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收入莫磊選編，《蘭花古籍擷萃》第4種)，〈種別〉，頁214。

擇其肥大之芽，以竹絲接插于蘭之根部，再取蜈蚣草或翠雲草包之，粗心者往往以為奇貨而受其愚」。其三是「假素心蘭」。素心蘭的香味較濃，故價錢較尋常者要貴，花販也會造假。他有位朋友是風雅之士，生平無其他愛好，惟於花草則有酷愛。一日，在上海城隍廟的花肆，以小銀元兩枚，買到素心春蘭一盆，是所謂價廉而物美。花共四箭，只綻放一朵，其餘尚含苞待放。他說：「固係素心，誠屬便宜，特恐贗鼎耳。」二、三日之後，朋友告訴他：「君言果然不謬，前日所購之蘭，真是贗鼎也。昔日含苞者，今已齊放，其花均有紫點。特不知先放之花，純白而無他色，其故何耶？」他說：「此用人工變化者，其法取半放之花，向硫磺上略熏之，其舌上之紫點，盡行退去，變成白色，其後開者，未經熏過，故仍有紫點。蓋硫磺之煙，有退色之功，一斑花販因藉以欺人耳。」²⁰⁶

還有用舊種充當新品者，故吳恩元曾告誡蘭友：「老種蘭蕙，伏於山中，謂之山伏；及起蕊，充作新花售賣，騙得大價。此是蘭客慣技，嗜蘭蕙者稍一不慎，即受其欺。」有趣的是，由於賣者多有作偽，故吳恩元記載：「賣蕙花頭子，俗稱『夏楞子』」。²⁰⁷ 今人葉軍然曾經總結古譜記載的詐騙方式有：（一）熏舌：用硫磺熏製蘭花的舌苔，使其變成素舌；（二）插吊：將真花插在假草中；（三）拼葉：將行草插在細花草中；（四）黏貼：將細花瓣舌拆開，再以膠水重新組合，或將細花黏貼在行花上，假冒新花；（五）烘葉：將蘭花受熱，使其改變顏色來假冒新品；（六）以次充好：將花品或花價較低的品種，冒充花品或花價較高的品種出售；（七）老種上山：將老品種種回山裏，待來年上山掘出下山，當做新品出售。²⁰⁸

有些人見不得人家有佳蘭，則以暗算的手段絕人所愛。沈復（1763-?）在《浮生六記》就記載：「花以蘭為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盆栽名家張蘭坡臨終時，贈送他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因此極為珍愛。其外出任幕友時，妻子芸娘親自灌溉，花葉頗茂。不到兩年，忽然枯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知何故，以為無福消受，只能感嘆而已。事後始知有人欲分栽而不果，故意以滾燙的熱水灌殺，沈復發誓從此不種蘭。²⁰⁹

²⁰⁶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防弊法〉，頁 223-224。

²⁰⁷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 319。

²⁰⁸ 葉軍然，《江浙春蕙蘭欣賞與鑒別》，頁 78-79。

²⁰⁹ 清·沈復著，金性堯、金文男註，《浮生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二，〈閒情記趣〉，頁 56。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也提到這種惡行：「暗算者出其陰毒之手段，或用滾湯，或用鹽酒灌之，使之不能存活。其用此損人不利己之下策者，始則羨慕之，羨慕之不己，思得而自有之，然分之既不許，竊之又不可得，於是不良之念生，而殺機動矣。」他有位黃姓友人，家中有春蘭一本，係荷瓣素心，花瓣潤而且厚，足以被編入蘭譜。種了六、七年，「愛之不啻拱璧」，但後來這盆素心蘭遭人暗算。暗算的人是同學某君（應係生員），「一錢如命，但自命風雅」，某日造訪黃君，在書齋中見到素心蘭盛開，仔細端詳數次，看似不勝羨慕。臨走時，向黃君說：「君之蘭頗佳，未知能否分惠乎？」黃君委婉拒絕，從此不常來往。後來因為有事遠行，一星期後回家，見盆中蘭葉黃萎，「拔起視之，根白如玉，且有勃發之勢」，不解其致死的原因。隨後仔細思考，「是必為某暗算，前日欲分不允，懷恨在心，因之而洩憤耳」。²¹⁰

清芬室主人曾說：「種種弊害，實防不勝防，惟有出之謹慎一途，或未雨而綢繆，早為之備，別無妙法」。²¹¹ 而類似的詐騙行為，在江浙以外亦有之。清朝末年，《嶺海蘭言》就談到廣東有類似騙局：「里有市白墨者，仿賣李鑽核之法，向蘭頭要害處，用針刺孔，塞以皂礬。初時蘭尚無恙，月餘，皂礬由蘭頭發作，便形凋謝。」故區金策特別叮嚀選購者必須提防。²¹²

另一方面，社會上常有名蘭被偷之事。其中，有僱用小偷奪人所愛者，如康熙年間，朱家角市井小民養出一名種蘭花，稱為「蜂巧梅」。有洞庭東山人金姓者，在朱家角開設當舖，欲出價購買，而對方不肯脫售，乃囑咐小偷竊出，攜歸洞庭東山，再分往各處。²¹³ 道光九年（1829），上海人張姓，酷愛蘭蕙，佳種頗多。有一劉某見而垂涎，欲購而不得，千方百計，終究不能如願，「乃密囑穿窬乘夜竊之，攜三十盆去」。張某告官，縣官飭命捕役調查，隨即前往劉宅起贓，將蘭花判歸原主。²¹⁴

有士人因為窮困，曾偷盜友人的蘭花換錢。乾隆年間，京口旗籍王三，因朝廷裁旗，分派至常熟縣為衙役，「喜蒔花，藉以為生計。嘗植名蘭二種，可百金值，一夕失之」。在養蘭的圈子內，「凡是名種者，不過三、四葉，葉皆可辨

²¹⁰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防弊法〉，頁 225-226。

²¹¹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防弊法〉，頁 226。

²¹² 清·區金策，《嶺海蘭言》卷下，〈白墨蘭種·綠墨素〉，頁 57。

²¹³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三，〈名貴〉，頁 44。

²¹⁴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卷四，〈紀事〉，頁 61。

識」。他偶然在花市上，見到自己的蘭花擺著。詢問花的來源，則說是某人所售。話還未說完，某人剛好到來，乃是熟識的士人，而其家境貧寒。王三知道後，故作仔細辨識之狀，最後說：「吾誤矣，此非吾故物，吾誤矣。」笑而離去。²¹⁵

而蘭花賊也常在四處活動，盜取名貴的蘭蕙。如杭州文思庵翠峰和尚，性喜蘭蕙，有名蕙三十餘盆，最上等者為翠禪梅。某夜，蘭花賊翻牆進來，盡數將其竊走，和尚悵然成疾，於道光十年（1830）化去，年九十餘。²¹⁶光緒十一年（1885）七月上旬，上海縣城內周錦堂家中的名種蘭花也失竊。報案後，包探秦少卿在街上見張阿福手持古式花盆，種有佳品蘭花，在街上兜攬主顧，詢問蘭花的來歷，言語支支吾吾，於是將其帶至巡捕房，周錦堂隨即前來認花。據周氏稟稱：「世居城內，盆種蘭花，放在高架上，不知該賊如何來竊？」上海縣令葛某判張阿福管押二十天，蘭花交周錦堂領去。²¹⁷

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廿三夜，《蘭蕙小史》的作者吳恩元，家中所養的蘭蕙也盡被宵小竊走。次日一早，友人龔文漱替他到梅花碑的化三千處測字，寫了「飛」字。化三千詢以要問何事，則答以失竊。化三千測道：「賊非一人，失物殆甚巨，當有萬金之值」，然現已在逃，必待逢九之日破案；或於失竊之日算起，在一九、二九、三九日，或逢月之初九、十九、廿九日，將來必有驗證。其後，果於六月初九日在湖州破案，將蘭蕙取回。不但是日期逢九，而且距離失竊之時，正好是「五九」四十五日，其測字可謂技術甚神。²¹⁸

由於蘭花竊賊猖獗，晚清餘姚的栽蘭業者更是積極防範。據《蘭蕙小史》記載：餘姚蒔植蘭蕙業者不下數十家，若培育出名貴品種，天井上面必要加罩鐵絲網，以防止偷竊。無力裝置鐵絲網者，往往由婦女輪流守夜。相傳當地栽花之家，如產下嬰孩，必將所種蘭蕙名種分栽一盆，等到開花後逐年分售，售得款項即存下來做為未來婚嫁之用，是故家人與婦女、小孩看待蘭蕙皆極珍重。²¹⁹

²¹⁵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四九，〈王三傳〉，頁391。

²¹⁶ 清·方時軒，《樹蕙編》，〈蕙緣〉，頁458。

²¹⁷ 《申報》光緒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英界公堂瑣案〉，頁3。

²¹⁸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318。民國以後，養蘭名家的蘭花被竊事件亦甚多，如五年，無錫榮文卿家；六年，寧波童棲香家；七年，上海陸永生家；十年，無錫楊六笙家。以上皆為大宗失竊。十一年，上海惠雨亭家，也被竊不少；十二年二月，惠家又被竊四十六盆。參見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319。

²¹⁹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318。

還有一個例子是傭工偷天換日。清末時，杭州顧晴嵐，每當春日必購名種蘭蕙數盆，以供玩賞。花落後即交傭工澆灌。但奇怪的是，至次年皆不開花。年年購買，年年如此。後來經行家審視，發現都是「行花之草」，真蘭早已被偷換。而其所以不開花，乃是在起蕊時，傭工怕被識破，將蕊全數拔去。自此以後，顧晴嵐再不買種，而三、四年下來，已花費銀子數千兩。²²⁰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曾說：「若夫竊取之法，無非出卑劣之手段，或買通僕役，設法以取之」。²²¹ 或許這名傭工，是受到人家的委託。

有人則在蘭花會的會場上偷換名種的蘭花。據《藝蘭秘訣》記載：「近日人心不古，見人有異種，必多方設法竊取之。竊取不得，設惡計以暗算之，或暗換以劣種。」一群嗜愛蘭花者，於蘭蕙開花時邀集同好，將家中所養之蘭聚集一處任人觀賞。不道德者見而愛之，設法暗換，花朵雖仍舊，而根株已非舊物。其方法是：「蓋以預備同式之盆，相似之葉，將花剪下，插入其中。驟視之，固若與原物無異，不知已屬贗鼎。」有鑒於此，藝蘭者若有奇品，往往深藏家中，不肯在會上陳列，不知者以為氣量狹小，而實因為人心不古，不得已如此。然而，有異種而不展出，未免辜負名花，而一番辛苦培植，功夫亦因而白費，「欲求兩全之策，惟有陳花而留根葉一法」——就是在送出展覽前，先將其花自行剪下，選擇其他盆葉部清秀者，將花插入其中，「既保他人之眼福，又能保我之名花」。²²²

結論

眾所周知，花卉是重要的經濟作物，特別是稀有的品種，常可在市場上獲得高價，甚至成為炒作的對象。十七世紀，荷蘭就曾出現鬱金香熱 (tulipomania)，導致球莖的價格飛漲，而於一六三〇年代達到高峰，一六三七年價格暴跌之後，荷蘭人對於鬱金香的愛好才逐漸退燒。²²³ 在蘭花方面，十八世紀以降，荷蘭、英國等國，從拉丁美洲、遠東等地引進熱帶蘭，一七七八年中國的建蘭也被帶到英

²²⁰ 吳恩元，《蘭蕙小史》附卷，〈紀事〉，頁 318。

²²¹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防弊法〉，頁 225。

²²²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防弊法〉，頁 224-225。

²²³ 參見：Mike Dash 著，李芬芳譯，《鬱金香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Anna Pavord 著，陸劍豪譯，《鬱金香》（臺北：藍鯨出版公司，2003）。

國，一七九四年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中已種植許多熱帶附生蘭。十九世紀初，印度、巴西、烏拉圭等地的稀有蘭花先後輸入英國，特別是蝴蝶蘭 (*Cattleya labiata*)，從而開始蘭花的交易炒作。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航運的發達，蘭花價格的高昂，刺激一些冒險家、旅行者、水手、企業家想辦法對亞洲、拉丁美洲的蘭花進行搜集。與此同時，英國的蘭花培育者、科學家將這些來自亞、美熱帶的蘭花進行雜交育種。當時，許多人為蘭花癡迷瘋狂，採蘭人甘冒生命危險，攀爬懸崖、進入叢林，尋找珍奇的品種；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甚至染上「狂蘭症」(orchidelirium)，為了闢建溫室、蒐購珍品，傾家蕩產。而這一「蘭花熱」，使得蘭苗的價格直線上升，在利物浦與倫敦的蘭株市場大拍賣上，一株蘭苗的時價十七金磅是常事，某些稀有品種甚至賣到七百磅一株。當「蘭花熱」瀰漫大英帝國時，美國亦不例外。一八五五年，一株指甲蘭價值四百三十美元；一八七五年，一株石斛蘭竟超過五百美元，蘭花成為奢侈品。²²⁴ 有趣的是，江浙人士不吝花錢購買名蘭，也是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同時達到高潮。

清代江浙地區蘭花消費所以一枝獨秀，與當地存在一群具備高消費能力的蘭花愛好者有關，而這些蘭癡正是江浙蘭花市場持續擴大的幕後推手。蘭花做為一種高附加價值的花卉，逐漸引發市場上的投機性炒作。從記載上看，此一現象始於十八世紀後半葉，當時揚州河工衙門的官員與縉紳大量收藏高價的建蘭。其後，蘇州與上海的富豪與大賈成為養蘭界的「霸主」；但不同於士紳多半收藏建蘭，後者炒作的對象以江浙土產的蘭蕙為主，而且尋覓獨一無二的品種，以便傲視群倫。由於其資本雄厚，加上炫耀的心理，彼此競逐的結果，交易價格在嘉道年間達到頂峰，一盆優質的名種蘭蕙，賣價不少在千兩以上，最高甚至達到三千兩。

長期以來，儒家主流的價值觀，強調奢侈絕非好事。然而吊詭的是，對於特定階層（如皇親國戚、富商大賈等）來說，奢侈是稀鬆平常，只不過其奢侈的對

²²⁴ 參見：Arthur Swinson, *Frederick Sander: The Orchid King*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0), pp. 31-43; Reinikka, *A History of the Orchid*, pp. 11-37, 50-59, 61-63; 王俊傑，〈世界蘭花種植發展史〉，《廣東園林》1982.3：1-8；吳應祥，《中國蘭花》，頁 6-8；張豐榮，《新養蘭學 II：洋蘭》（臺北：雷鼓出版社，1994），頁 11-16；Orlean，《蘭花賊》，頁 54, 58-81；Phillip Cribb and Michael Tibbs, *A Very Victorian Passion: The Orchid Paintings of John Day, 1863 to 1888*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p. 51-54; Robert H. Hesse, introduction to *Orchidelirium*, by Harold Feinstein (New York: Bulfinch Press, 2007), pp. 8-9.

象，多半是珠寶、服用、宅第之類，較少涉及花卉領域。唐宋以來，牡丹曾經為人們所嘉賞，長安、洛陽、成都等地也出現過類似的品賞文化。史載唐代長安牡丹一本值數萬錢，宋代開封姚黃、魏花初出值五千錢，洛陽姚黃、魏花一枝值千錢，成都雙頭紅初出時一本值數十千，祥雲初出時一本值七、八千。²²⁵ 但與清代江浙豪富之品賞蘭花相比，這些價格不啻是小巫見大巫。

人類對於物質的消費，大約來自需要 (needs)、需求 (demands) 與欲望 (desires)，²²⁶ 而對於花卉的消費與投入，已非需要與需求的範疇，主要是一種心理欲求或心靈活動。西方關於消費的研究曾經指出：上階層對於獨特性 (distinctive) 的追求永無止盡——當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等起而抄襲上流社會的習性時，這些上流人士只好一再轉變其消費模式。²²⁷ 在明清絕大部份時間內，商人的文化品味總是亦步亦趨地跟隨士大夫，但乾嘉時期的商人與富豪卻對士大夫的蘭花鑑賞品味棄而不顧，即捨建蘭而就浙北蘇南的蘭蕙，棄香氣而重花蕊，這樣的發展可說是一個反例，商人似乎漸漸在尋找自我主體性，在文化品味上走自己的路——即使被士大夫視為俗氣。

然而，江浙富豪與商人何以在嘉道年間高價購買蘭蕙？這是一個令人疑惑卻值得思考的問題。這段時間，正值鴉片進口日增、白銀大量外流、銀貴錢賤及經濟蕭條之時，²²⁸ 或許有商人因買賣鴉片而獲利，藉此行為附庸風雅，或一擲千金以誇富？或者有商人因幣值變動造成損失，故透過投資或投機蘭蕙以保值，或在短時間內博取利潤？確切的答案雖尚未找到，但卻不無可能。

蘭花價格的不斷飆漲，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一個表徵，相較於湖南、貴州、四川等地的蘭花「有行無市」，²²⁹ 江浙的蘭花交易不僅暢旺，而且價格令人

²²⁵ 舒迎瀾，《古代花卉》，頁 8-9, 13-15, 101-107。

²²⁶ 王寧，《消費社會學——一個分析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9-32。

²²⁷ Robert Boccock 著，張君政、黃鵬仁譯，《消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頁 33。

²²⁸ 參見：全漢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 下 (1957)：517-550；林滿紅，〈中國的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中國海洋發展史會議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 1-44；〈銀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佈（1808-1854）——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上 (1993)：89-135；《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²²⁹ 邱仲麟，〈採集、栽培與交易〉，頁 418。

咋舌。江浙特定客群對於蘭花的狂熱，與蘭花的消費市場多元連結有關。在乾隆以後，投資者與投機者的熱錢，持續湧向相關的產業。當時，許多環節緊緊相扣，即有採蘭人在各處山上搜尋，又有許多客商在江浙皖各地走動，蘇州則有山貨行做為集散之處。在這個過程中，還出現一種掮客 (broker)——「花螞蟻」。一旦聽聞有稀罕的品種，掮客（花螞蟻）即在收藏者間串門講價，牟取可觀的中介利益。此外，還有一種具有代辦性質的掮客，接受愛蘭者訂貨（如尋覓某一特定品種），再轉請採蘭人在山上搜掘。總體而言，其市場分工之細緻與層層聯繫，實已遠遠超過其他花卉產業，甚至在花卉以外的產業亦不多見。

明清時期的許多產業，開始出現類似選購指南或鑑定手冊的冊籍，其中最著名的如綿布商的《布經》與《布經要覽》、²³⁰ 當舖商的《當舖集》、《論皮衣粗細毛法》、《當舖》、《成家寶書》與《定論珍珠價品寶石沉頭》。²³¹ 而在花卉行業方面，雖有許多專書與栽培手冊出版，但鑑定性質的圖冊卻極為少見。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以降，江浙地區出現許多蘭蕙圖譜。這種勾勒花蕊、花萼等細部的蘭蕙圖譜之出現，雖緣於收藏家將其擁有的獨特品種繪製成冊，但在後來的市場運作過程中，卻成為愛蘭者、投資（機）客、掮客按圖索驥，及蘭花會上評審者品評蘭蕙的重要指南，這無疑是蘭花鑑賞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 的一個重要表徵。

蘭花鑑賞專業化的另一指標，是蘭蕙展覽的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類似花卉慶典的活動，如北宋洛陽牡丹盛開時，知府即舉行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插花釘掛，舉目皆花」。而揚州盛產芍藥，蔡元長任揚州知府時，亦仿效洛陽舉辦萬花會，用芍藥至十餘萬枝。²³² 但這與清代出現的各種花會——如太平天國之亂以前，上海城隍廟按花季舉行的水仙會、梅花會、牡丹會、芍藥會、蘭花會、杜鵑會、菊花會等²³³——相比，前者為官辦，後者乃民間發起，性質有所不同。其中，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蘭花會，更提供收藏者、藝花匠公開展示所養蘭蕙的場合，稀有的名種蘭蕙，經過評

²³⁰ 清·范銅，《布經》（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清·不著撰者，《布經要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²³¹ 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清鈔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²³²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二，〈老蘇二蘇〉，頁624。

²³³ 清·謝元淮，《養默山房詩藁》卷一七，〈上海邑廟看杜鵑花〉，頁56。

審者選拔，頓時聲名大噪，身價水漲船高，在某程度上亦助長投機者炒作蘭花的機會。易言之，蘭花會實為商品化 (commercialization) 的另一種形式。

總之，在江浙一帶，水仙、梅花、牡丹、芍藥、杜鵑、菊花與蘭花雖同為名卉，且都曾有花會之類的活動，但除了蘭花之外，均未形成一個多元的鑑賞體系與投資（或炒作）管道，而此正是清代江浙蘭花鑑賞值得關注之所在。清代後期一百多年間，江浙蘭花交易與投機炒作的發展，顯示當時花卉商品的深層變化，而這些富貴者收藏蘭花的奢侈心態，在現代以前應該也是少見的。

另外，在蘭花鑑賞專業化與商業化的側面，則是詐騙技倆的專業化。由於社會上有人癡心愛蘭，給予歹徒製造騙局的機會，而且充分展現在移花接木等智慧型犯罪 (intelligent crimes) 上，從花蕊到根部都可以作偽造假。迄至光緒年間，仍有被騙千兩的案例。收藏或投資名種蘭蕙的風險，較諸往昔已高出不知多少倍，這也是蘭花交易過熱的一個指標。此外，商品價值與被偷的可能性往往成正比，當蘭蕙炒作價格越來越高，蘭花賊隨之蠢蠢欲動，有時還接受覬覦者委託，高級蘭蕙遂成為下手對象。為了防制蘭花賊，晚清餘姚一帶養蘭的花匠，甚至在花圃上罩上鐵絲網，或者派人輪流守夜。

附帶一提的是，隨著華南蘭花市場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晚清廣州也有類似的炒作現象。據清末區金策《嶺海蘭言》記載：大葉的金絲馬尾蘭，因日本商人前來採辦，一株價至五、六十兩銀子，而「紈袴子弟拾倭奴餘唾，爭先購致，往往以價重傲人，俗態可哂」。²³⁴ 另外，大良羅澹園的金邊墨，一株價至四十兩，曾為日本人購去。²³⁵ 由於價格日增，故《嶺海蘭言》云：「蘭一盆而過十槍，貴者價至百餘金，村農衣食半生矣！」²³⁶ 但百餘兩一盆並不算貴，還有更高價者：「金絲白墨一種，歷來未聞未見。近時大良羅遂生有此種，惜為陳伯庸所獲，索價每株千金云。」²³⁷ 每株價至千兩，亦可見廣州蘭花市場之炒作日益厲害。

2009.09.25 初稿

2015.05.04 五稿

(本文於民國一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收稿；一〇四年六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²³⁴ 清·區金策，《嶺海蘭言》卷下，〈大葉蘭種·金絲馬尾〉，頁 69-70。

²³⁵ 清·區金策，《嶺海蘭言》卷下，〈黑墨蘭種·金邊墨〉，頁 61。

²³⁶ 清·區金策，《嶺海蘭言》卷上，〈叢談〉，頁 43。

²³⁷ 清·區金策，《嶺海蘭言》卷下，〈白墨蘭種·綠墨素〉，頁 57。

後記

本文初稿曾先後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合辦，「明清時期江南市場經濟的空間、制度與網絡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Market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zi Delt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pace,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年10月5-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會議」工作坊第四次座談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11月20日)；及本所九十九年度第十三次學術講論會(2010年9月6日)上宣讀，承蒙 Joseph P. McDermott、大木康、卜永堅、曾品滄、柳立言、李貞德、祝平一、李尚仁等先生給予指教。投稿後又蒙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上誠摯感謝！

附錄：民初江南城市的蘭花會

民國以後，蘇州依然舉行蘭花會。民國初年所修《吳縣志》記載蘭花曾說：「種出浙東，吳中好事者多移植之」；「春日，各園林有羅列種種作蘭花會者」；記載風俗又云：四月中旬，「蘭花盛開，嗜蘭家擇日會於名園，曰品蘭雅集，數百里異種畢至，金蘭為上，素心次之，有梅瓣、荷花、水仙之目」。²³⁸ 留園蘭花會，就是其中之一。民國初年，葉楚傖 (1887-1946)《金昌三月記》記載：留園「季春之蘭花會，傾城士女連翩而至。但汗香粉膩，笑倩語低，蘭花此時固不欲以解語媚人，人亦未嘗以蘭花之媚為媚也」。²³⁹ 迄至民國十七年三月，《申報》仍然報導：「留園近有蘭花會，城中有香草癖者，各一名種出賽。一時冠雲峯前，人影幢幢，而阿黛橋邊之花葉，泥其膩客。駕車來游，衣香花香，黏成一片，游神期間，如入香國」。²⁴⁰ 另外，繫千〈冠雲峰下賞蘭花〉一文指出：「前數日，蘇州之留園，有蘭花會，盛極一時。苦兒院外，士女如雲；上津橋畔，車馬水龍，幾如山陰道上」。留園新廳上，「名花芳草，羅列架上，裝以彩磁之盆，供以紫檀之座，圍以錦屏，寵以金花。水仙之種，荷花之瓣，鳳眼素心，並蒂鴛鴦，珍貴異常，各極其妙，奇香滿室，沁人心脾。」²⁴¹

實際上，蘇州除了獅子林、怡園、留園之外，其他的園林，如遂園、拙政園，也有蘭花會。民國三年 (1914) 四月二日，孫振烈 (1843-1919) 從無錫到蘇州看蘭花會，十點鐘到遂園，「蘭尚未齊集，進門券每人六十文」。十二點鐘，「蘭始畢集，中有梅瓣數種，微帶紅色，有素心綠色者，瓣如綠玉琢成，肥厚，邊白色，極為可貴。約有百數十盆，素心者不及十盆」。午飯後，又轉到拙政園，「進門券每人八十文，蘭不若遂園之多，而佳者較多」。²⁴² 民國四年五月，江蘇各界捐款做為救國儲金，遂園蘭花會三天，門票所得計二百零九元，由園主送往

²³⁸ 吳秀之、曹允源等修纂，民國《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五〇，〈輿地考·物產一〉，頁 846；卷五二上，〈輿地考·風俗一〉，頁 871。

²³⁹ 葉楚傖，《金昌三月記》（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下冊，頁 803。

²⁴⁰ 《申報》1928.03.22，第 17 版，〈春風駘蕩說蘇州〉。

²⁴¹ 《申報》1928.03.27，第 17 版，〈冠雲峰下賞蘭花〉。

²⁴² 孫振烈編，《次哲次齋主人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民國三年條」，頁 301-302。

銀行收存。²⁴³ 民國十二年，烟橋〈遂園蘭花會記〉記載：蘭花陳列在容閒堂前，計有三十餘盆，「以空氣溫燥，雖僅逾兩日，已多憔悴。蓋蘭花之養，倍難於梅，佳種則剪其花，別插盆盎，尾濡金汁，得延五、六日不疲，若以真花出眎，或相損耳。」當時有一老者，乃蘭花主人，飲酒微醺，談論蘭花的鑑賞，「謂蘭之心有葷素，蘭之瓣有厚薄圓尖修短，蘭之耳有張闔，蘭之舌有卷舒，各能出色。肩平背厚而圓，必為上乘。色或草綠，或玉白，則無所出入也。」²⁴⁴

民國以後，上海蘭花會更盛。據民國七年所纂《上海縣續志》記載：「三、四月間，蘭花會多在豫園，花品最上者，居正中最高，謂之『狀元臺』，士女往觀者絡繹」。²⁴⁵ 民國六年以後，勸業場三樓也有蘭花會。²⁴⁶ 民國八年，上海南市滬杭鐵路車站東邊的半淞園，開始舉辦蕙蘭會。²⁴⁷ 而康腦脫路的徐園主人徐貫雲、徐凌雲兄弟，也持續舉辦蘭花會。²⁴⁸ 民國九年，上海縣城西門外的競適種植園，亦組織蘭社，藉瞿宅舉行蘭花會。²⁴⁹

清朝滅亡以後，杭州的蘭花會應該是持續舉行，如民國七年三月，杭州內河水警徐廳長，曾「逼請當道假座樓外樓，開賞蘭大會」，一、二兩師師長、警務處夏處長、一區菸酒公賣局楊局長、硝磺總局朱監督俱蒞席參觀。²⁵⁰

²⁴³ 《申報》1915.05.22，第7版，〈救國儲金彙誌〉。

²⁴⁴ 《申報》1923.03.23，第19版，〈遂園蘭花會記〉。

²⁴⁵ 吳馨、姚文枏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疆域·歲時附〉，頁137。

²⁴⁶ 《申報》1917.03.31，第11版，〈蘭花會移設勸業場〉；1917.04.25，第11版，〈勸業場之點綴〉；1919.03.30，第11版，〈勸業場舉行蘭花會〉。

²⁴⁷ 《申報》1919.04.15，第11版，〈半淞園將開蕙蘭會〉；1919.04.24，第11版，〈半淞園將開蕙蘭會〉；1923.04.30，第17版，〈記半淞園之蕙蘭佳會〉；1925.03.22，增刊第3版，〈半淞園春蘭會之第一日〉；1930.04.17，第17版，〈半淞園賞蘭記〉。

²⁴⁸ 《申報》1919.03.22，第11版，〈徐園之蘭花會〉。

²⁴⁹ 《申報》1920.03.16，第8版，〈競適園開品蘭會〉；1921.03.23，第7版，〈春蘭會補誌〉；1923.05.02，第10版，〈競適社之兩花會〉；1924.04.27，第10版，〈競適園夏蘭會〉。

²⁵⁰ 《申報》1918.03.20，第7版，〈杭州快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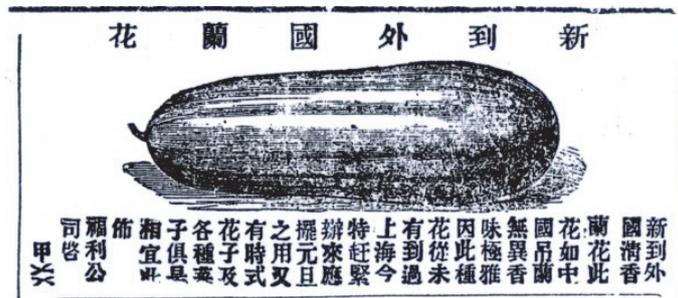


圖一：晚清南京士人品蘭之圖
（《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第 12 冊，圖 117）



圖二：明《九畹遺容》建蘭圖

（明·周履靖編，《九畹遺容》〔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6, 36）



圖三：洋蘭種子廣告

（《申報》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第4版廣告，〈新到外國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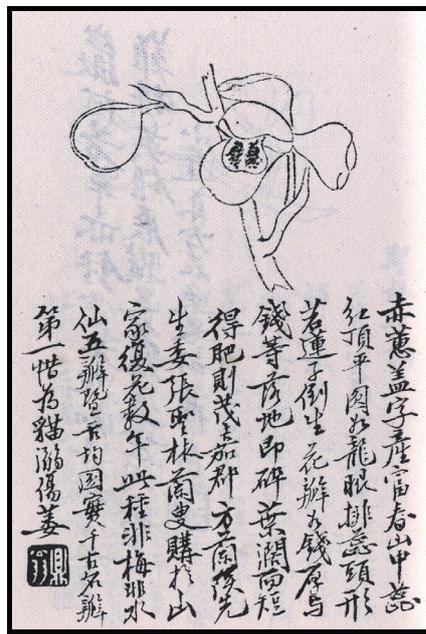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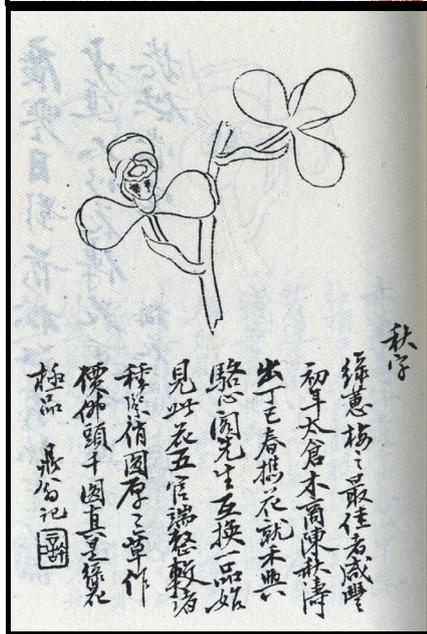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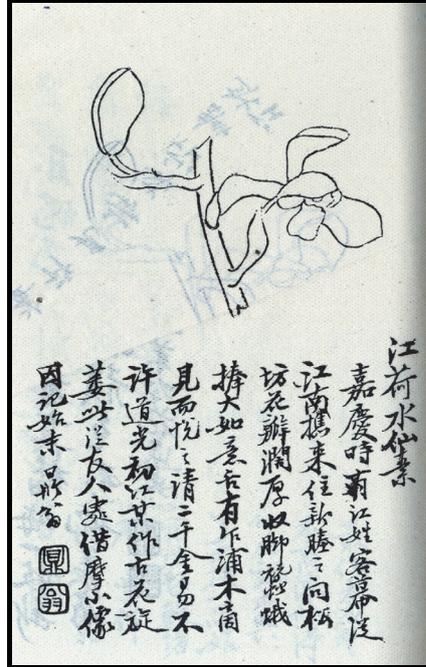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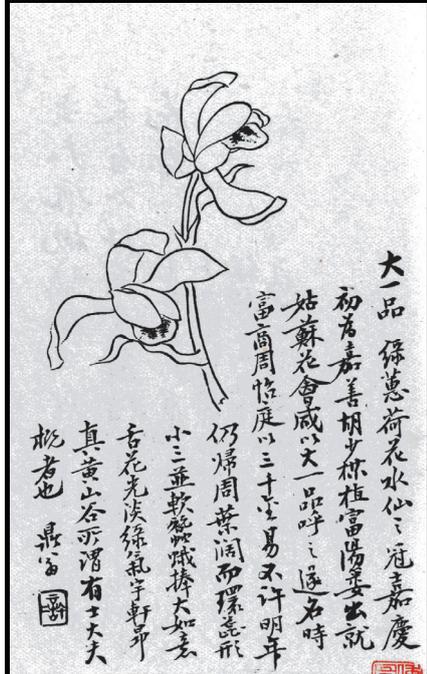
圖四：《費夢儂蘭蕙譜》舉例之一

(「上海蘭花網·古譜集珍」，<http://www.shorchid.com/showarticle.asp?id=1612-1614>；按：圖畫旁邊的按語，應係後人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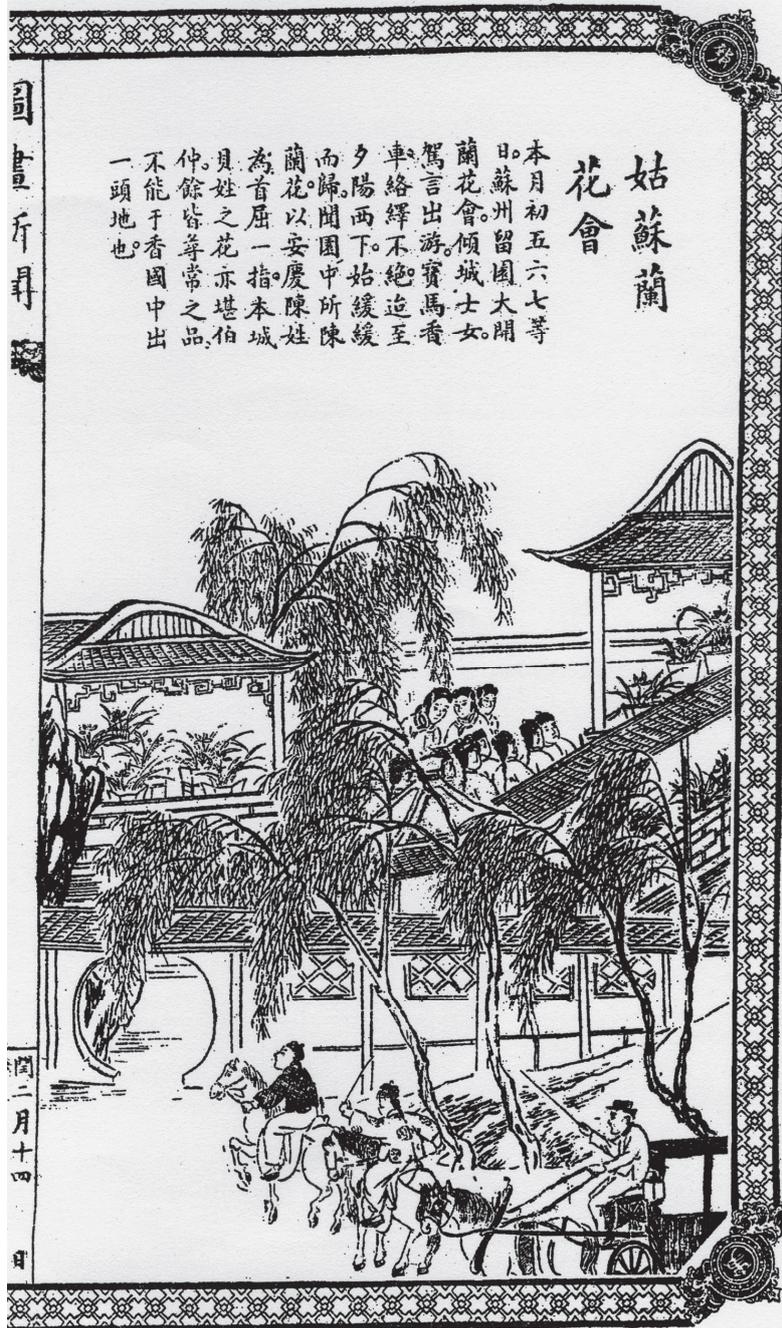
圖五：《費夢僊蘭蕙譜》舉例之二

(「上海蘭花網·古譜集珍」，<http://www.shorchid.com/showarticle.asp?id=1612-1614>；按：圖畫旁邊的按語，應係後人所加)



圖六：《蘭蕙同心錄·蘭蕙圖譜》舉例

(清·許鼎鈇，《蘭蕙同心錄》〔臺北：劉雅農據手寫本影印，1968〕，下冊，頁 2a, 24a, 25a, 26a。按：原書無頁碼，此頁碼係自行算出)



圖八：蘇州留園的蘭花會
(清·時事報館編，《圖畫新聞》上冊，頁4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宋·李綱，《梁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方以智編，《物理小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明·王象晉著，伊欽恒註釋，《群芳譜詮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
- 明·宋濂著，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明·李流芳，《檀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周履靖編，《九畹遺容》，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明·張鳳翼，《處實堂續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葉權著，凌毅點校，《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明·謝肇淛著，印曉峰點校，《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不著撰者，《布經要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方時軒，《樹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清光緒重刊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毛祥麟著，畢萬忱點校，《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王令，《古雪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王韜，《瀛壖雜誌》，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玉鮓生，《海陬冶遊錄》，上海：世界書局，1936。
-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新興書局，1977。
- 清·朱文治，《繞竹山房續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清嘉慶元年刊本（殘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收入佚名輯，《海天秋色譜等六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
- 清·朱克柔，《第一香筆記》，收入莫磊選編，《蘭花古籍擷萃》，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第1種。
- 清·朱錫綬，《沮江隨筆》，清光緒十六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邱仲麟

- 清·江峰青、顧福仁等修纂，光緒《重修嘉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佚名，《杭俗怡情碎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清·佚名，《廣陵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吳友如等繪，張奇明主編，《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
- 清·吳騫，《桃溪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校點，《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1990。
- 清·李銘皖、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李麟，《虬峰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杜文瀾，《采香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杜文瀾，《藝蘭四說》，臺北：華文書局，1969。
- 清·汪縉，《汪子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沈大成，《學福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沈復著，金性堯、金文男註，《浮生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阮升基、甯楷等修纂，嘉慶《宜興縣志》，臺北：宜興同鄉會，1965。
- 清·周亮工，《閩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揚州：廣陵書社，2003。
- 清·法式善，《梧門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俞樾，《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冒襄，《巢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胡鳳丹，《退補齋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范銅，《布經》，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時事報館編，《圖畫新聞》，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 清·桂馥著，趙智海點校，《札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揚州：廣陵書社，2003。
- 清·納蘭常安，《宦遊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71。

- 清·袁世俊，《蘭言述略》，臺北：廣文書局，1976。
-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清·袁翼，《邃懷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高士奇，《北墅抱瓮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清·區金策著，魯子青校注翻譯，《嶺海蘭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 清·張光照，《興蘭譜略》，清嘉慶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清·張岱著，夏咸淳點校，《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清·張岱著，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曹溶，《倦圃蒔植記》，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清·許瑤光，《雪門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許鼎餈，《蘭蕙同心錄》，臺北：劉雅農據手寫本影印，1968。
- 清·許羹梅著，楊滌清、莫磊詮釋，《蘭蕙同心錄詮釋》，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 清·陳梓，《刪後詩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程哲，《蓉槎蠡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程庭鷺，《小松圓閣雜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清·黃協埴，《淞南夢影錄》，臺北：新興書局，1978。
- 清·黃凱均，《遣睡雜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揚州：廣陵書社，2003。
- 清·翟灝，《湖山便覽》，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
- 清·趙俞，《紺寒亭詩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著，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魯銓、洪亮吉等修纂，嘉慶《寧國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錢陳羣，《香樹齋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錢維喬，《竹初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儲大文，《存研樓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謝元淮，《養默山房詩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點校，《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譚宗浚，《荔村草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邱仲麟

- 清·譚獻著，范旭倉、牟小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清·嚴元照，《柯家山館遺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顧祿著，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櫂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
-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 王利器等編，《歷代竹枝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 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 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清鈔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 申報社編，《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 牟安祥，《蘭蕙小史名品賞析》，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
- 吳秀之、曹允源等修纂，民國《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吳馨、姚文枏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美）林樂知主編，《教會新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
- 徐珂編著，《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孫振烈編，《次哲次齋主人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芬室主人，《藝蘭秘訣》，收入莫磊選編，《蘭花古籍擷萃》第4種。
- 楊鹿鳴，《蘭言四種》，民國鉛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劉雅農，《上海閒話》，臺北：世界書局，1961。

二·近人論著

王俊傑

- 1982 〈世界蘭花種植發展史〉，《廣東園林》1982.3：1-8。

王寧

- 2001 《消費社會學——一個分析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王鴻泰

- 2004 〈閒情雅致——明清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2.1：69-97。
- 2006 〈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73-144。
- 2011 〈從經濟民到聲色犬馬——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Ming Studies》63: 18-37。

- 全漢昇
1957 〈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下：517-550。
- 宋立中
2007 〈論明清江南鮮花消費及其社會經濟意義〉，《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9.3：45-53。
- 何光岳
1993 〈都梁考——兼談蘭類作物的作用〉，《農業考古》1993.1：63-72。
- 辛齊
1988 〈話中國蘭花〉，《生命世界》1988.6：42-44。
- 吳應祥
1983 〈蘭花史話〉，《世界農業》1983.11：48-50, 16。
1991 《中國蘭花》，北京：林業出版社。
- 邱仲麟
2007a 〈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18：75-108。
2007b 〈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城市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3：473-528。
2007c 〈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盆景與瓶花之賞玩〉，《九州學林》5.4：120-166。
2009 〈明清社會的蘭花狂熱——以江南為中心的考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合辦，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Market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zi Delt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pace,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10.5-6。
2012 〈明清福建蘭花的產銷〉，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387-440。
2014 〈採集、栽培與交易——明清江南的蘭花業與貿易圈〉，上海師範大學近代社會研究中心編，《情緣江南：唐力行教授七十華誕慶壽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頁391-419。
- 周建忠
1998 〈蘭花栽培歷史考述兼釋《楚辭》之「蘭」〉，《雲夢學刊》1998.3：1-10。

邱仲麟

周肇基、魏露苓

- 1998 〈中國古代蘭譜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8.1：69-72。

林滿紅

- 1991 〈中國的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中國海洋發展史會議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1-44。
- 1993 〈銀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佈（1808-1854）——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上：89-135。
- 2011 《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林麗月

- 1991 〈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師大歷史學報》19：215-234。
- 1994 〈陸楫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新史學》5.1：131-153。
- 2001a 〈《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頁 121-134。
- 2001b 〈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史研究通訊》4：9-19。

徐泓

- 1986 〈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24：83-110。
- 1989 〈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組》，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137-159。

陳心啟、吉古和

- 1998 《中國蘭花全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 2004 〈蘭花文化和歷史〉，《森林與人類》2004.5：58-60。

陳江

- 2006 《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陳國棟

- 1994 〈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5.2：159-179。

- 張長虹
2010 《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豐榮
1994 《新養蘭學 II：洋蘭》，臺北：雷鼓出版社。
- 常建華
2011 〈舊領域與新視野：從風俗論看明清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447-477。
2014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史學集刊》2014.3：95-110。
- 傅衣凌
1957 《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舒迎瀾
1993 《古代花卉》，北京：農業出版社。
2007 〈清代江浙滬之蘭蕙花市與花會〉，《園林》2007.1：38-39。
- 黃敬斌
2009 《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鈔曉鴻
2001 〈近二十年來有關明清「奢靡」之風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74：9-20。
- 葉軍然
2007 《江浙春蕙蘭欣賞與鑒別》，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 盧小明
2000 〈蘭花叢考〉，《農業考古》2000.1：276-278, 280。
- 魏華仙
2006 《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與消費研究》，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 Bocock, Robert 著，張君玫、黃鵬仁譯
1996 《消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Dash, Mike 著，李芬芳譯
2000 《鬱金香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Orlean, Susan 著，宋瑛堂譯
2002 《蘭花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邱仲麟

Pavord, Anna 著，陸劍豪譯

2003 《鬱金香》，臺北：藍鯨出版公司。

Clunas, Craig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ribb, Phillip, and Michael Tibbs

2004 *A Very Victorian Passion: The Orchid Paintings of John Day, 1863 to 1888*. London: Thames & Hudson.

Feinstein, Harold

2007 *Orchidelirium*. New York: Bulfinch Press.

Hsü, Ginger Cheng-Chi (徐澄祺)

2001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nikka, Merle A.

1972 *A History of the Orchid*. Miami: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Swinson, Arthur

1970 *Frederick Sander: The Orchid King*.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Yang, Lien-sheng (楊聯陞)

1957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36-52；中譯見陳國棟譯，〈侈靡論——傳統中國一種不尋常的思想〉，楊聯陞，《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169-188。

三・網路資訊

清・費英，《費夢僊蘭蕙譜》，「上海蘭花網・古譜集珍」

<http://www.shorchid.com/showarticle.asp?id=1612-1614> (瀏覽 2009.10.10)。

“The Orchid in the Human Imagination”

<http://depts.washington.edu/popctr/orchids.htm> (瀏覽 2011.12.09)。

Orchid Enthusiasts, Orchid Shows and Orchid Thieves:
Orchid Appreciation and I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Orchids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gentleme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needless to say, i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vorite flowers among literati. This enthusiasm for orchids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Many professional books and cultivation manuals on how to grow orchids were published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areas, where publishing of such books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meet the demand for orchids in these areas, merchants had transported orchids from Fujian, Anhui, and southern Zhejiang to large cities such as Nanjing, Yangzhou, Suzhou, Hangzhou and Shanghai where orchids were in great demand. People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areas had always appreciated and preferred the fragrant Fujian orchids;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ince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rchants and wealthy people had hyped orchids grown in the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Zhejiang areas, hop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shapes of the stamens. Therefore, illustrated orchid catalogues that were similar to appreciation guidebooks began to flourish during the same time. Around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rchid exhibitions had been held in many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Suzhou.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ups and downs, the exhibitions were held continuously until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Publishing of illustrated orchid catalogues and holding of orchid exhibitions showed that orchid appreciation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ized.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althy businessmen and literati had been willing to spend a great amount of money to buy precious orchids. Because of this orchid enthusiasm, prices of orchids had been hyped—a record showed that the purchase price of a pot of orchids was as high as 3,000 taels of silver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addition, reports on precious orchids being stolen were also very common. Moreover, orchid sellers had used a variety of ways to defraud buyers. Up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邱仲麟

people were still spending 1,000 taels of silver to buy a pot of precious orchids and ended up getting a fake one.

Keywords: orchid, hype, appreciation guidebook, orchid show, professionalization